

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08 年

资中筠：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

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

田纪云：两次大寨之行

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斗争

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

目 录

特稿

- 1 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资中筠
5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雷 颐
9 启动善的竞争.....郭宇宽

群言堂

- 14 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杜导正 冯 健 彭 迪
钟沛璋 袁 鹰 何 方 张广友 张 鸣 展 江
吴 思

往事录

- 26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李 锐
32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靖 鸣
39 “犯正确”与“紧跟错”
——不准实事求是的悲剧.....冯东书

一家言

- 44 合成一个新东西
——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辛子陵
49 从反清筹款看另一种传统.....郭玉闪

亲历记

- 51 两次大寨之行.....田纪云
53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李临雅

怀人篇

- 58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悼柏杨先生.....李 钧

治方杯

- 63 实践标准讨论中新闻理论界的人和事.....余焕椿
67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彭小莲

海外事

- 72 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金 雁

编读窗

- 80 就“机制”一文答客问.....李树桥
48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李光羽等

顾 问：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qikan.com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

——汶川地震感言

● 资中筠

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人们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比较,那次因为完全封锁信息,宣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就在余震波及的北京,居民只经历了暂时在室外生活的不便,却没有激起对唐山受灾同胞感同身受的关怀,也无从关怀,根本谈不到全民救灾。差可比拟的却是同一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期,人与人之间距离忽然拉近,感情似乎升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经常发生的因挤车、排队、自行车相撞而吵架之类事一时绝迹,连大声叫嚷都少。有人刚要发作,旁人说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就可以立刻化解。似乎在这种时候吵架就是亵渎逝者,大家正面临共同的重大灾难,个人间的摩擦都微不足道。这种情绪固然由于周总理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多年压抑无告的痛苦、悲愤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都喷发出来,寄托在对周总理的哀思中。此事与当前的事件性质当然不同,只是说明‘国殇’有时能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民气’,无论多强烈,多高尚,如没有其他条件,是难以持久的。灾难过去

后,一切恢复正常,各种矛盾,各种劣根性,各种陋习也随之恢复,也许还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新的恶行。温总理题词‘多难兴邦’,是古训,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经验,此时以此鼓舞民气十分恰当。但是在现实中‘难’不会自然而然通向‘兴’,从前者转到后者有许多条件,这条件需要人为地去创造,其艰巨的程度不亚于救灾,而所需要的胆识、智慧、韧性和毅力则过之。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情况下,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善心、善举以及各种创新成就用切实的措施、法律和制度给予保障,使之持续下去,使人的善意能有畅通的渠道尽情发挥,当然包括废除一些阻碍‘兴邦’,甚至造成‘多难’的旧制度、旧法规,乃至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来一次‘除旧布新’。

“多难兴邦”,人所共祷。见到报刊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各种提法。这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这次灾情虽然严重,还是局部的,并非全民都“浴火”。我只希望这次能在社会转型中标志着一个新的拐点,伤痛过去后不再回到老路,想到了几点,或许可以作为漫长的‘兴邦’道路上的几蹬台阶。

为媒体松绑

这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下面几点新意:

关注和展现了苦难:一场严重灾害的直接后果首先是相关人群受难,是公众最关注之事。但是直到不久前的雪灾,我国媒体对各种天灾人祸一贯的做法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只让公众在事后看到已经解决的景象(有时实际并未解决),着重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镜头上出现的多是受惠者的感激、满意的笑脸,而看不到受难者的不

幸。甚至灾难尚未完全过去,就急忙奏凯歌,表彰功臣。这次则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灾情的惨状、灾民的苦难得到了现场真实的展现;救援的手段、过程比较透明,既公布已有的成绩,也坦诚说明尚待解决的难题,对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疑虑有所交代,尽到了新闻媒体名副其实的职责。

新闻渠道多样化:除了指定的主流媒体外,许多报刊都及时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到第一线采访。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报纸和期刊已经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优秀记者、编辑和作者,这次得以一显身手。尽管电视现场采访权仍为中央电视台所专有,但纸质媒体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报道、精彩的摄影和多视角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凡是有条件的报刊都不甘炒别人的冷饭,既然大家都报道同样的题材,就必须争取有自己的特色,挖掘自己的故事,发挥所长,表现出独到之处。以我经常收到的多种报纸、期刊来看,的确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或是本刊记者、评论员自己的稿件,或是外部作者的文章,有特别感人的纪实和抒情,有对关键人物的采访,也有视角独特的评论。此时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联系,约到好文章,也是报刊的一种功夫。总之,这一次的媒体(包括期刊)避免了千人一面,真是百花齐放。我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为之唏嘘泪下,同时看到我国媒体人的高度敬业精神、胆识和专业能力,欣慰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钦佩也包括对中央电视台在一线的记者)。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释放出来,我国新闻媒体的实力和才干是可以赶上国际水平的。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作为一名老人,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同时看到民族的希望。

问责和揭短稍有突破:天灾固然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伤亡的程度与人为因素的关系是公众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往日的惯例,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绝对禁区。这次则有所突破:例如震前预报问题、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救灾物资和钱款的发放问题,等等。当然,公开见报的只是冰山一角,远非全貌,但是抓住个案不放,向纵深挖掘,已经触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本质,足以引起警觉,增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难度。

必须承认,这次新闻报道中所表现的新气象,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些不合理的成规、禁令被冲破、被弃置不顾的结果。事实证明,在灾难来临时,透明度越大,越有助于消除疑虑,释放善意,从而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内销’,或小道消息满天飞,坏事成倍地放大,谣言不胫而走,只能造成人心惶惶。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有司’不察。我国新闻管制的习惯路数是: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统一口径、“编辑”过滤,或封锁真相,设立各种禁区,束缚媒体手脚,最后想到(或根本不想到)的才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一次,灾难太深重了,举世关注,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还有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冲击,突破了预设的种种禁区,不可阻挡。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

灾难的高潮过去后,这种‘非常’能否持续下去变成‘正常’,还是又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我希望前者,担心后者。最低的希望是不出现‘秋后算账’的恶劣行径——例如现在暂时‘法不责众’,危机过后,伺机以其他借口,选择一些对象进行报复。进一步希望是使这次的‘非常’持续为‘正常’。这单凭‘良心发现’是不足恃的,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改革,用法律固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应该变‘内部’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人民日报》4月30日文章标题)。与限制新闻报道相反,是限制新闻官和有关部门的权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跑批件”、“买卖批件”成为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和腐败之源。解决之道无他,就是放开经济自由权,缩小审批范围,许多经济活动不需要‘批件’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就可发挥作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诚然,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权与钱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宣传领域则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为 NGO 和志愿者鼓劲

众多志愿者活动在灾区,是这次的新事物,套用一句时下流行语: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人数有百万之多。他们是十万正规解放军和近百万有组织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巨大的补充。一次灾难过后,有无数可预料和想不到的需求,专业队伍终究力量有限,志愿者刚好见缝插针,不论在人力、物力和精神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大增加了救援力量。但是其意义远不止此:对于受难者来说,得到了更多的温暖,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关系,所谓“天灾无情人有情”;对于志愿者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识了深重的苦难,也体验了最美好的情操,自己得到了磨练,增长了才干和自信。正如许多报刊所说:“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作为志愿者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连父母都感到惊奇。对于全社会来说,在物欲横流,人们哀叹道德滑坡之时,志愿者的行动促成了一种集体道德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长远意义将在今后不断显示出来。

这一次,由于灾情严重,也由于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对一切国内国际援助采取开放政策,因而短期内收到了大量的捐赠。灾后重建还将继续收到钱与物。现在募捐不难,而难在救灾款和物资最有效的分发。这项工作艰巨而复杂,需要大量的人手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单靠各级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何况有些重灾区政府人员本身已成救援对象。在这方面政府与民间力量相配合,可以成倍增加灾后救援的效益,使钱、物尽其用。

志愿者若是完全单个人分散行动,有许多不便处,多数有一定的组织,不论大小。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亦即 NGO,是志愿行动的主体。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并不都是公益性质,有许多就是娱乐性的俱乐部,也踊跃参加到救援行列中来。“NGO”“志愿者”开始进入国人语境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21世纪,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普及,公民责任感的加强。只是我国有关法规相对滞后,还是沿袭改革以前的旧思维,防范多而鼓励少,严重妨碍其正常发展,使得“做好事”的渠道不畅通,反而取不到“合法性”。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些新的法规,有一定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限制,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次空前规模的志愿者

活动是可喜的新现象,也意味着政策的开放。当然,志愿者在我国是新事物,在这次行动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地方一拥而上,或缺乏专业培训,反而“添乱”。同样的,林林总总的 NGO 也会有良莠不齐,甚至有犯罪诈骗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洁,不能因噎废食。我希望这次的开放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标准的精神,应以新的眼光对待 NGO,变防范为鼓励,从而研究和通过新的法规。NGO 的发达,在近期,可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多一分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成为政府部门有力的补充;在长远,对提升公民觉悟,促进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做好事的渠道畅通,而做坏事非常困难。总之,以积极的法规鼓励 NGO 健康发展,结果必然利国利民。

无论是平时还是灾时,无数社会需求不可能靠政府全包,这是大势所趋。早日制定积极鼓励、有利于兴利除弊、促使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此其时矣!

整顿吏治为当务之急

从不久前的雪灾到当前的震灾,我们都见到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赶赴灾情最严重的第一线,慰问群众,指挥救灾。有时同一地方去不止一次,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赢得了公众的拥戴,也获得了国际赞誉。以至于有外国报刊文章说“中国总理不可复制”。我也心怀感佩。但是感佩之余,又不免想到,一国总理这样事必躬亲,恐怕有不得已处。中国政府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层机构;无论纵向比(历史),横向比(外国),当前我国的“公仆”与人口的比例数都是最多的。这种官吏古称“吃皇粮”,今称“纳税人供养”,还有自古有名的箴言曰“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于是我想到一连串的假如——

假如这么多官吏都能各司其职,各级行政机构都运转无碍,还需要统领全局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这样辛苦地推动,亲自督战么?中央领导慰问灾民,亲自了解灾情和救援情况,都是必要的,是起精神的鼓舞作用,也能建立亲民形象。但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线行动,具体部署救援措施的应是当地各级“父母官”。从省到乡,这一官吏群体克尽职责了么?

假如他们平时都廉洁奉公，以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福祉为念，以对“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同样心力关心教育，包括校舍，会有这么多学校建筑坍塌吗？有多少学童可以幸免于难？

假如赈灾物资、钱款从来都能全部、有效地发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而没有截留、挪用、贪污现象，可以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实惠？假如财务过程都能透明，捐助人还会那么不放心？例如著名演员慈善家李连杰坚持他的“壹基金会”的捐款必须看到收款人按手印的收条，这样的捐赠者不止他一个，曾有慈善家专门雇人追踪他的捐款落到何处。这是平时。在当前的大灾面前如何呢？以成都高级住宅区占用地震帐篷的事件为例，千百万人生命所系而又如此紧缺的物资，竟敢“走后门”，截留挪用，群众愤慨理所当然，如果发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谅解，至少举报有功。但是据说有关部门不致力于惩罚真正的罪犯，却以扰乱秩序为名拘捕揭发举报者。这种颠倒是非又是惯性作用在作怪。

假如平时各级官吏没有作威作福的习惯，有尊重百姓人权的观念，还会发生殴打志愿者的事件么？那一记耳光打得那么顺手，那么不假思索，足见已成为本能的条件反射。这次是在非常时期，打的又是救灾志愿者，所以引起舆论大哗，不得不道歉，还是辩解甚多，不是痛快情愿的。而且还责怪媒体曝光。可以想见平时对待其治下的乡民是何态度。“顺手”打了老百姓，会有人问责，会道歉吗？

目前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无法落实，越是优秀的报刊“风险”越大，除了主管部门的旧思维之外，各级政府文过饰非的本能汇集成强大势力是主要原因之一。实际情况是倒过来，不是媒体监督政府，而是地方官监督媒体：凡发生对自己“政绩”不利之事，首先想到不是追究“坏事”的起因、责任，而是发岌于封锁和抵制媒体报道真相，无所不用其极。有所谓“防火、防盗、访媒体”之说。对于不在自己管辖内的媒体，则施展“告状”手段，以借助高一级的压力，或用官场潜规则，互相打招呼，牺牲的是社会正义之声、本地百姓的利益。也许一时有利于某些人的仕途，但最终受损的是该地方政府的集体“政声”，因为在方今之世，防民之口

是很难做到的。

所有这些都指向“吏治”非整顿不可。当然，懈怠、渎职（姑不论贪污腐化）的只是一部分，即使平时表现不如人意的，在这非常时期冲向第一线，尽心尽力，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乃至像林强那样以良心战胜官场规则的当不在少数。这里讲“整顿”，主要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治本之道路阻且长。总的方向不外乎从人治到法治；从对上级负责到对百姓负责；“政绩”的考核标准和手段彻底改革，等等。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就是舆论的监督。变“闻过则怒”为“闻过则喜”只能期待于极少数人，重要的是剥夺其“泄怒”于揭发他们的媒体的权力，从而保障舆论监督权。还有一种集体痼疾很难治愈：例如重形式，轻实效；重官轻民，以及已成为本能的按等级办事（从建筑质量到分发救灾物资都按官位）；对上虚报成绩，对下封锁信息，说得不好听就是“欺上瞒下”，等等。这种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很难责备具体的个人。这些问题众所周知，议论不断，来自朝野的各种改革的建议、方案也已很充分，只是举步维艰。现在机会难得，借强震之力，借民族凝聚力最大之时，迈出一大步，应是阻力最小的。治标的措施则包括对个案的处理，对已经群情汹汹的事件，不再敷衍掩盖，问责、奖惩越认真，越公正，越透明，则越能安抚受伤的心灵，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者系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已经出版，数量有限，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已全部售完，请不要再汇款，仅有2007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7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7年下半年（7-12期）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 雷 颐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十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

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示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示”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示”前去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60多名藏民星夜兼程,从遥远的西藏高原送来了240匹良马!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

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第 343 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 月 9 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 年 1 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 30 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 30 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

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 7.8 级大地震 30 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 年第 1 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 1 月 9 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 14 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讲：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 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 15621 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1 页）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

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从当时的“主流”媒体那时其实只有“主流”，根本没有“非主流”媒体)报道、宣传中，便可了解当时的“执政观念”。为对那段历史的体味、感悟更加生动、真切，恕我详引当时文章。

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标题前半句的“十二级台风”，是指一年前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报道说小靳庄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15日，《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解放军某部“红一连”和灾区人民一起深入批邓》，文章说：“抗震救灾工作决不能只管粮和房，不管线和纲。”8月27日，《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提出“抗震救灾任务重，工作多，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地震震倒了房子，但不能震断我们思想上阶级斗争这根弦。”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9月7日，《抓批邓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

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1976年8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的短评《人定胜天》写道：“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此处用“乱子”一词颇有深意。原来，1956和1957年，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国内也有一些集体性事件发生，毛泽东这期间的许多讲话、包括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将这些事件称为“乱子”，认为“乱子”不可怕，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唐山地震三个多月前，群众抗议、反对“文革”的“天安门事件”被他们称为“乱子”，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此时再提“乱子”，一是强调“抗震不忘批邓”，二是强调“坏事变好事”。这篇短评结尾写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学习与批判》是当时地位仅次于“两报一刊”的杂志，有“小《红旗》”之称，但比“两报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原来，就在太平军建都“天京”后的第二个月，江苏突然发生地震，“天京”震感明显，一时人心惶惶，且不久前发生过叛逃事件，为稳定军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内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

行速追浩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之句。由于太平天国避讳‘心’字,此诏以‘草’字代之。《学习与批判》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对旧世界的‘声讨书’,是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对‘自力更生’的宣传也比比皆是。由于长期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援助;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表示准备援助灾区;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宣布,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外相建议,迅速运送大批救灾物质的方针,外相还指示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立即发送……对国际社会这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政府统统拒绝。7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外国的任何援助,以此告知世界中国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人民日报》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以此方式委婉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在接受钱钢采访时,迟浩田将军曾痛心疾首地感叹:“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

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援助么!”(施昌学、钱钢:《开放:国际视野的大国胸襟》,《中国质量万里行》,2008年第6期)

一句话,当时‘抗震救灾’的纲领是‘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这种观念,是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逻辑。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被漠视;生命必须从属于‘政治’/‘政权’/‘斗争’。

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革’终于破产,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1979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终于公布了死亡人数。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就是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接受国际社会救灾援助方面,一些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国门初启,开始被动接受国际援助,即不主动提出和要求国际救灾援助、并有限接受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国际救援的认识也更深入。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字会终于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此后,在重大灾情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已成惯例。

三十年的许多转变、变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更明显表现出来。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媒体、网络的报道之及时之充分,超过以往;以往最为敏感的死亡人数,这次也即时报道;电视、视频传出的那一幅幅或惨烈或动人的画面,更为直观地将真实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从一开始,媒体就对各类救灾物资的发放进行监督,如5月22日《南方都市报》“救灾帐篷惊现成都市区”报道,及时给人敲响防止腐败的警钟,深获民众好评。这一切,不仅没有像以前的执政理念所担心的那样,会人心浮动、引起社会不稳,甚至会动摇政权基础,反而前所未有地激起了人们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者的敬佩和感动、对执政者举措的高度赞扬,反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加救援活动。事实证明,以前几乎对所有信息都不公开、都采取保密措施,是对人民的不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无视,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现在超过以往的信息公开,是对人民的(下转第13页)

启动善的竞争

● 郭宇宽

有多少善行“涉嫌违法”

一张照片引起了多少人的感动,当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来到募捐点,投入自己的一天乞讨所得时,很多人在这样的善行前显得渺小。

而就在几天之后,一则新闻在网上激起了热议,“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法律规定个人不得从事募捐组织活动,这位老人涉嫌非法募捐,应予以制止,数额巨大可追究其法律责任。”笔者看到网上的跟帖,大多数都是对专家的人身攻击。但遗憾的是,从法律的角度判断,专家的意见并没有错误。已经有新闻证实了,各地都有一些自发募捐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的叫停,比如据《京华时报》5月16日的消息“两男子自发募捐被警方叫停”,据说两名男子来到大兴区兴华园小区门口,以赈济四川地震灾区名义向小区居民募捐,“清源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称两人自行募捐涉嫌违法,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

类似这样“涉嫌违法”的募款行为,在灾后的这些日子里,不胜枚举。为了“非法募集捐款”最出风头的大概就是牛博网。灾后的第一天,在网站上就公布了“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作为一个没有在民政部正式注册为公募慈善基金的网站,他们这么做可以说是知法犯法。发起者们都是一批铁杆的牛博网友,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笔者的邮箱里保存有一封牛博网发起人罗永浩的来信,介绍5月16日,他们在建设银行的募捐账户就“被上面冻结了”,而且在成都的志愿者“由两名威龙猛探冲进办公室把人架走”,稍后组织者之一的黄斌也被叫到成都市公安局问话。公安局的建议是“把善

款转交给政府部门或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但遭到了拒绝。直到21号,在各方面的交涉下,账户才被解冻,而这个双方的妥协,似乎是暂时的,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向黄斌、杜桥等人指出,向灾区捐款,应通过正常渠道,并希望他们妥善安排处理。”换句话说这样的公民自发筹款,依然不是被法律认可的“正常渠道”。

按照民政部的说法,“目前有权接受捐款的机构只有各级民政部门、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红十字会。其他任何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募集社会捐助。”但在全国高涨的救灾热潮中,很多法律都已经被自发的突破了,从矿泉水到卫生巾,很多公民都在以自己信赖的方法募集善款,直接向灾区运送物资。甚至一些民间组织还在灾后第二天联合起来组织起了“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到目前为止已经筹集了600多万元的资金和物资直接向赈灾一线输送。他们都努力做到账目公开透明,连办公室管理费用每天的需求,也都贴在網上,公开向社会募捐。笔者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负责人张国远联系上时,原来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的他刚刚回到成都,25号他被攀枝花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两名干警带回攀枝花调查了一整天,据说他有非法集资的嫌疑,当时办公室的朋友们都非常担心,因为“联合办公室”不是一个法人机构,所有捐款都是走张国远的个人账户。最后的结果是有惊无险,他有些自豪地告诉笔者:“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我们对委托人负责,每一笔钱都很清楚,比红十字会管理水平高得多,连一瓶水的去向都有记录。”据张国远说陪他回来的警察对他都很佩服,对他表示歉意,还说“咱们也是执行公务”。

但毕竟他们的‘联合办公室’还是一个不受法律认可的‘黑户’，包括救灾的筹款活动，严格地说也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

对于这么多公民的自发‘私自募捐’，有律师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善意违法’。

众人质疑的‘正规渠道’

当一些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作为‘慈善黑户’，在暧昧的状态下为救灾奔波的时候，对于有合法募集善款权力的组织，日子却并不很好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这次民众募捐的主渠道，被各媒体和赈灾晚会广为宣传，据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在强国论坛的介绍：截止到5月23日晚9点，我们红十字会系统一共接收到的款物达到59个亿，截至22日18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就已接收到来自境内外捐赠的款物达50.6亿元人民币。

质疑也随之而来，5月14日，门户网站网易宣布停止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合作，改为与廖冰兄基金会合作。该网站公布的原因是：通过在线捐赠系统在方便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并可以起到全程监控的作用，“而合作方‘中国红十字总会’则不愿意接受此方式”。这之后一系列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就在捐款者中被酝酿了起来。

恐怕历史上的红十字会新闻官员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过，网上传言，中国红十字会某官员在接受CCTV-4采访时表示，将送往灾区价值1300万元的1000多顶帐篷。经计算，每顶帐篷高达1.3万元，一时网上怀疑、指责声不断，中国红十字会20日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应网上质疑帐篷价格“1174元，这几乎是全国价格最低的帐篷”。

恐怕没料到的是，这个解释招来了更多的质疑，一些好事网友，启动人肉搜索技巧，列出了一批在600-1000元之间符合标准的帐篷生产企业报价单。并且质疑为什么红十字会这么大宗的采购不搞公开招标。一个网友说“如果和供应商砍价，我相信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买家，哪个厂家也得给个面子的，如果是我做采购，我完全有信心把价格压到750-800的样子。一顶能为红十

字会省下近400元的开支。我想象我这样的采购红十字会也不敢要我的：）’在此之后没有看到红十字会新的解释。除非在制度上做到事先公开透明，很大程度上采购价格中假如蕴藏猫腻，也是一个天地良心的事情，即使事后审计也无法澄清。

而对于红十字会管理费用的争论，也是一个让其尴尬的问题。据中国新闻网消息，5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应急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平向公众作出解答：“项目支持费是在资金项目过程中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所发生的一些费用，也叫‘项目管理费’，是客观存在的，在执行任务和开展任何任务时，都存在一定的配套支持问题，例如在发放救灾物资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支持费用。”还强调“在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中国红十字会规定，项目支持费不会超过6.5%”。

但接下来也许是出于公众的压力，又有很多这样的新闻标题出现，红十字会“未从救灾款中留取管理费”、“善款全部用于灾区”。包括王平还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今年接收的‘5·12’地震灾区捐赠款物将全部用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不会提取任何管理费。”

这里存在一个偷换概念而且逻辑混乱的问题，善款全部用于灾区并不代表不留管理费，救灾的物资需要钱，当地的协调统筹也不可能不花钱，事实上恰恰在灾区的救灾及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

恐怕很少有慈善组织会向中国红十字会现在这样尴尬，世界各国的慈善组织，包括各国红十字分会都会大大方方地公布自己的管理费用，10%到15%的管理费用是一个通常可以被接受的标准，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我们需要百分之多少的管理费”呢？

“慈善垄断”惹的祸

根据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动。”红十字会不仅在主要人事任命上从

属于政府,内部有“科级”、“处级”,而且享受“人民政府的拨款”。

这样有较强政府背景,但是又以民间组织面貌出现的,在研究公民社会问题的学术界,被称作“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这样的组织在一些转型国家比较有代表性,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并且掌握了民间募款的渠道。甚至在我国有的时候,比如赈灾中,地方政府会直接替代民间组织,通过政治动员成为募集善款的主渠道。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某些组织打着政府旗号进行募捐,或者政府直接出面向企业和个人募集捐款,因为其掌握的权力,往往有严重的摊派性质,违背了公益事业的志愿精神。这类募捐,往往捐款目的不符合雪中送炭的原则,往往并非用于紧要的公益项目,比如为城运会募捐、为某文化节募捐,捐款使用也极不透明。并且这样的 GONGO 在中国民间慈善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以垄断性的姿态出现。中国红十字会,就像共青团、工会和妇联这样的官办民间团体一样,在全国各个行政区的各级政府都有分支机构。而另一方面根据 1998 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这个规定被归纳为“一个地区,一个领域,一家机构”。这也就意味着,红十字会在全国各地所占据的空间,从法律上阻止了任何希望从事救死扶伤工作的民间组织合法注册的空间。在 1998 年颁布实施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特别是“合并了一批宗旨、业务范围相同相似的社会团体。”所以目前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被注册的社团,一方面享受政府拨款,一方面垄断了社会捐款渠道,成为了像股票上市企业指标一样的“壳资源”,任何组织用红十字会的名义,就要向他们交管理费。

这些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宏观环境取得了很大改善,但在实际运作中民间非政府组织依然会遇到许多体制性障碍,他们坐在一起抱怨最主要的主题往往就是“注册难”,当前的政策还规定,社团注册必须在广义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挂靠,而被挂靠单位既不能从社团中提取利益,

又必须为社团的任何问题负责任,如果社团的工作触怒了政府,弄不好挂靠单位的领导就会影响乌纱帽,所以虽然《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但实际上这项权利必须在政府的允许下才能落实。这造成中国大量致力于社会公正、维护人权、公正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非营利组织,无法按照其宗旨注册为正式社团。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迫到工商局按照企业来注册,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民间非营利组织”,绝大多数从法律上都不被认可。被迫以企业形式注册,这意味着不能合法接受捐款,而且需要按照企业的标准纳税。还有一种是笔者接触过不少 NGO 组织索性从此成为“黑户”,其工作人员的名片上印着基金会、联合会的头衔,干脆在中国大陆不登记、不注册,自行其事地开展工作。

笔者接触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有一个普遍的情绪,就是对红十字会这样垄断性“GONGO”的不满。回到前面社会舆论对红十字会的种种质疑,很多人把矛头焦点对准它收了多少管理费,害得红十字会只好玩文字游戏,不敢承认自己收管理费。这在笔者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一幕,关键不在于红十字会收取管理费,一个组织的运行乃至发展不可能没有管理费,而且在救灾这样调动统筹非常严峻的领域,即使 10% 的管理费在专业的角度来看也并不算多。问题在于,背负垄断的原罪的中国红十字会无法证明,自己提取 10% 的管理费,在救灾方面的工作,就能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而这恰是他们“凭什么收管理费?”的关键。

比如前面那个没有正式注册的“NGO 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负责人,就敢于拍着胸脯告诉笔者,他们的效率和管理水平,包括透明度,都要比红十字会“水平高出不是一个数量级”。他们理直气壮把每天需要的误餐费、电话费、人员津贴等管理开支都在网上公布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组织和个人,明明知道给这些“黑户”捐款不是合法渠道,而且不能享受免税,面临被二次征税,还是愿意把钱捐给他们。因为这些组织的公益属性,虽然没有被中国目前的法律认可,但他们已经通过口口相传,在民间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口碑和公信力。给他们捐款的人,

相信 100 块钱到他们手里能比在其他组织手里产生更大的公共效益。

所以目前红十字会的承诺要把每一分钱用在灾区,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同样使用钱,只有在这样竞争而不是垄断的情况下,才能透明地反映效率和成本。台湾灾害管理研究专家丘昌泰先生告诉笔者一个故事,让人感慨良多。台湾 921 地震后,慈济功德会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在灾后重建中,政府的一些组织要花很大一笔钱才能重建一所学校,而慈济功德会的人因为有信仰支撑,很多专业人士参与都尽心尽力,而且不计报酬,花一半的钱就能办起来,甚至房子盖的质量更好。就怕货比货,大家看到同样把钱都花在救灾上,但钱到了慈济手中就能发挥更大的效率,所以以后都愿意把钱捐给慈济。

这种竞争也会使社会理性的看待民间组织的需要。一个组织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会用自己的工作证明,自己的公共服务是值这个管理费的,而不会向中国红十字会这次这样可笑地站出来,辩白自己不收管理费。

竞争已经启动

尽管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 2008 年的这场大灾,已经激活了很多人的思考和梦想,也深化了人们对于慈善的理解。

一些私募基金已经走在了前面。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自 2005 年放开私募基金会的申请以来,中国已经有 300 多个私募基金会出现,大量资金业已由此从企业或个人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红十字会与慈善总会相比,那些私募基金不能公开向社会募捐,大多由企业或者企业家发起。虽然募款方面尚不能体现和“GONGO”们的竞争,但在慈善理念方面却展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风采。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发起人周庆治先生平时就经常强调,“慈善并不只是在捐款支票上签个字那么简单,而要保证每一分钱花出效率和质量来”。他认为有人捐出一笔很大的数字,就觉得很光荣了,媒体一报道,接下来的事就不管了,觉得已经尽了心,是不对的。用自己的智慧盯住钱是怎么花的,怎么更大的实现社会效益,更加重要,

这样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负责任的慈善态度。

在这次灾后的第三天,南都公益基金会就宣布:“紧急安排 1000 万元专款,用于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利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公益服务。”而且专门用于“专业人士和专业志愿者的人力资源服务成本,原则上不提供物资、硬件购置的资助。”换句话说,与红十字会不承认自己收管理费相反,南都公益基金会专门资助一些民间组织“管理费”,资助领域包括医疗救护、信息平台、家庭重建、疫病防治、儿童救助、孤残帮扶、抗灾减灾知识普及与教育、环境保护、老人救助、心理辅导、志愿服务、社区重建、研究、咨询与培训等。

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告诉笔者:“这一千万比起动辄几十个亿的红十字会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们的目地就是为了帮助民间组织成长,并发挥作用,我们的第一笔资助都不超过 5 万,就是要鼓励和激活大家竞争,我们看哪个组织做得好,花钱效率高,就再提供第二笔,第三笔的资助。”

有一些企业家更是直接把企业家能力运用于慈善事业中,5 月 24 日笔者在北京见到了刚从什邡和都江堰灾区考察回来的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他痛心地看到这么多学校倒塌,而政府大楼或居民楼倒塌没那么严重。他认为不能光怪建筑商偷工减料,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对这类公共设施投资不足。所以他在灾区就当场决定要参与学校的建设,他准备筹集 6000 万,用于灾区学校建设。笔者问他,有没有考虑捐给哪个机构来做,他非常自信地说:“用不着,我们直接来干,盖房子,搞建设,我们企业就是专家,而且效率高,那些政府的机构都没我们专业。”而且他告诉笔者,当地政府对此非常欢迎和支持。

最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次灾害中,各级政府普遍对民间团体和公民的自主参与,带有善意乃至鼓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各国志愿者团体表达感谢的镜头,通过 CCTV 传遍了全国。如果回到 20 年前的中国绝不会是这样。记得 2005 年笔者在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德基金会名誉董事长丁光训大主教的时候,他提到在爱德基金会成立之初,举步维艰,政府中

有一些左的思想认为,一个有宗教背景的组织搞慈善是‘收买人心’,接受国外团体的捐助和志愿者是‘丧失中国人的尊严’。为此丁老感慨,这样的观念太狭隘了,“只要是慈善,就该大家一起来做,比谁能做得好。”他说:“真正爱的精神也包括宽容别人,为什么不可以让各种人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显示出爱呢?对于所有的真善美我们都应当欣赏,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如果一个佛教徒看到了,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决不会说,因为你的信仰和我们不一样,你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价值……我们基督徒也绝不认为因为自己的努力和上帝联系在一起,就有权要求别人也这样,比如雷锋、比如白求恩,他们不信基督,他们有另一种信仰,但同样表现出博大的爱,不相信上帝的人也可以作出让上帝喜悦的事情。”

丁老那时的忧虑已经成为了过去,今天在地震的废墟上,甚至在未来的5—10年,一场竞争正在自发展开,这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竞争不一样,笔者把它称作‘善的竞争’。30年前的改革开放后发了赚钱的竞争,过去计划经济时大量政府所扶持的工厂,效率低下,濒于倒闭,而在竞争中

一批民营企业却脱颖而出,壮大了中国经济的力量,没有这一次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这样的经济腾飞。

这一次的灾难却自发地在促进中国的第二次开放,笔者把它称作‘社会治理’的开放。在这次开放中,社会意识到,慈善和关怀及一些公共品的提供,并不是,也不该是任何机构和组织的特权,任何有志愿的公民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参与。这场竞争,竞争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花钱,竞争谁能最有效、最明智地运用资源造福社会。在这场竞争中,一定会有一批民间组织和公民,脱颖而出,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公信力。张国远就向笔者表示,由于这次他们的工作虽然是“黑户”,但是各界都很信赖和认可,这次地震过后,他会考虑辞去原来的工作,专门成立一个专业与灾害危机管理的公益组织。而中国红十字会也会在这种竞争中产生反省,就像它这次表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危机意识一样。

这一次‘善的竞争’将促进中国社会的强大。

(责任编辑 杜晋)

(上接第8页)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次地震,还允许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救援队入境救灾;5月19日,又宣布将接受部分外国医疗队来华协助救援。这些,更是1949年建国后的首次,意义确实重大。接受包括允许境外专业救援队、医疗队入境在内的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国内抵御灾害、减轻损失的需要。表明了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这次大地震,大量非政府机构、组织(NGO)积极参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超过以往。表明这三十年间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由小渐大。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民间社会将与国家良性互动,获得社会更大的尊重,得到政府理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民间社会、NGO等能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是国家与个人间的中介和缓冲器、减震器,是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因此,那种对民间社会、NGO的防范甚至敌视态度,委实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以前,只有领袖去世才设哀悼日,才降半旗,才汽笛、警报呜呜。唐山地震时罹难者几十万人,没有哀悼日、没有降国旗。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病逝,从9月9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各地和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次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设立,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降半旗,汽笛、警报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呜呜,标志着对生命和普通人的尊重。

这次抗震救灾的几项‘第一次’,是三十年社会发生深刻进步的标志,更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具体体现。将‘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灾与此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比较,使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对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能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

——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

地震有感

● 杜润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合心合力，同舟共济。
实现“多难兴邦”。

四川大地震

● 李 锐

这次抗震救灾中，各方面表现都好，胡锦涛、温家宝同志表现很好。我在病中有感，赋诗一首：

无限爱心悬震灾，神州朝野紧关怀。
和谐社会人为贵，三大文明晓色开。

（注：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开放公开是正确方针，万万不可摇摆

● 杜导正

温家宝总理总结汶川地震救灾的基本经验，讲了八个字：以人为本，开放公开。我认为，这是两条根本性经验。5月24日，温总理在灾区接受中外记者的联合访问，有记者问：公开透明开放的方针会不会变化？温总理说不会变，既然是好方针，为什么会变呢？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很郑重，代表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当然，有主流就会有支流，不同看法总会存在。

先说以人为本。

这次救灾，政府完全随着灾情走，灾区需要什么，灾民需要什么，政府就给什么，就做什么。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上，政府真正成了公仆，灾民真正成了主人。到底谁服从谁，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党和政府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答案。对比唐山地震和非典报道，我们党和政府完成了一个重大转变。我希望大家明确意识到这种转变，维护这种转变。

以人为本的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的总结提炼，是很准确的。大家都同意这个提法。可能有分歧的地方是：究竟是通过“执政为民”的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呢，还是不为民、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许可执政。我认为，执政地位并不是天然的，并不是不可动摇的。执政者必须以人为本，必须听从人民的选择。这种区别，说到底，就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以人为本是否可以实现，前者要碰运气，后者是有保障的。

再说开放公开。

关于地震救灾的报道，这次不仅对内开放，也对外开放。结果，公开透明，准确迅速多样，效果非常好。国际国内方方面面都根据报道做出反应，连决策者也要依靠传媒提供的信息。国际国内对这种进步给予了高度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公开这几个字，最近又不大提了，开始淡化了。在执政公开、开放、透明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近几年尤其在本次抗震救灾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千万不可摇摆，不可淡化，更不可后退。

为什么要淡化“开放公开”这条绝对正确、绝对成功的经验？到底有什么顾虑？可能有些同志害怕影响稳定，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则害怕黑幕曝

光。如果是前者,我觉得不必多虑。媒体和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善意的,通情达理的,在此次抗震救灾中表现得感天动地,淋漓尽致。因为他们是稳定的受益者,也是稳定的维护者。应该相信媒体和公众的判断力。如果是后者,为了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限制舆论监督,这样的稳定绝不可能持久,这样的利益也无法长期维护,害人终会害己。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开放公开这八个字,应该持续宣传,贯彻到底,万万不可淡化,更不可摇摆后退。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划出媒体的权利边界

● 吴 思

一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在开放程度上,不仅远远高于唐山大地震时期,也明显高于非典时期。于是,中国和世界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了各种反应。这些反应,从总体上看,对抗震救灾大有益处。灾民、政府以至全中国,都从媒体开放中受益。中国政府进步了。

二

媒体开放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次依然有争议。我们看到的开放程度,超出了有关管理部门最初划定的边界。但是,我们看到了出界犯规的动作,却没有立刻见到黄牌和红牌,我猜这背后有一番利害计算。

大灾突发,把灾情传出去,既合乎灾民的利益,也合乎救灾组织者的利益。限制灾情传播,灾民不高兴,救灾组织者不高兴,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高兴,全世界都不高兴。再说,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怪不得政府,也怪不得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媒体即使越界,也是可以容忍的。压制他们的成本太高。

但是,媒体一旦开始深入追问,譬如追究学校高比例倒塌的原因,追究救灾款项管理中的问题,

追究这些问题的体制背景,就难免触犯某些利益集团,双赢的时代便结束了。

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追究越深,冲突越大,出黄牌甚至出红牌的可能性随之增大。我们正处于这个拉锯地带。天灾可以放开说了,这是进步。但是人祸未必容许放开说,这要看闯祸的人有多大来头。那么,多大来头就不许说呢?也不好一概而论,还要看说的一方有多大来头。这是一个潜规则众多的模糊地带。

三

其实,设身处地替管理部门想一想,在模糊地带工作也不容易。他们所维护的未必都是自己的利益,还往往闹得里外不是人。我统计分析过近十年来报刊受到顶级处罚的原因,第一大类,就是触犯某些地区、部门和个人利益,这一类的比例高达30%多。第二大类,20%多,因触动某些历史问题受罚。由此可见有关部门的压力来源,他们主要为谁做嫁衣裳。我们在这次地震中还能看到一些冲突,例如对立的思想见解,不同群体的情绪,某些群体还希望借助政府权力打击对手,这种期待也构成对管理部门的压力。

陷入这类困境,历史经验表明,最圆滑也最稳妥的解决办法,就是立一个规矩,公开颁布出来,让各方有所遵循,把难以协调的矛盾推给规则,缩小管理部门和个人的操作空间,同时减轻管理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订出规则之后,进步可以巩固,管理可以超脱,吃力不讨好的事可以少做。即使大小和尚们少了一些寻租机会,对寺庙和方丈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

规则有不同的层次。立法的层次最高,但在这个多变的改革时代,很难指望短期内订立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新闻出版法。不妨退而求其次,颁布一个暂行条例,划出媒体的权利义务边界,然后,一切按条例办。任何一方违反条例,都有办法公开问责,消解被迫暗箱操作的压力。

四

扩大媒体开放的空间,比上述计算所涉及

利害关系更加重大。

如果把当代中国想象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三类环境。一是市场,二是官场,三是社会舆论。市场环境中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构成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官场的选择机制也是大家熟悉的:对上负责,统一思想,不听使唤就换人。这套规则自有存在的理由。可怕的是,官场规则大肆扩张地盘,侵犯甚至吞并市场和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环境的存在和扩展,意味着公众了解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并且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评价和反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众支持的,就容易发展。即使公众支持或反对的手段还很有限,千夫所指,威慑作用总是有的。倘若官场吞并了舆论,统一思想,舆论一律,一切以官场是非为是非,我们就很容易走错路。连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都出过大错,谁还有勇气宣称:统一到我这里不会错?

有了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空间,有了彼此竞争的不同声音,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对各种危机做出相对适度的反应。人心自有一杆秤。这是保证中国在顺乎民意的道路上健康发展的选择机制。制订并颁布一套界定媒体权利义务的暂行条例,可以创造并维护这种机制。同时,也可将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

从观念更新、逐案权衡到制度约束

● 展 江

中国官方在四川大地震中的媒体政策,外国媒体形容为“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

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首先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天灾人祸事件的信息公开政策思想有很大进步;其次是面对这次空前严重性的灾害,隐瞒是难以想象的;第三是开放这种大灾害的报道一般不会导致官员被直接追究责任。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与今天的说法不同,但

是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目标反映了当时执政党的一种主导意见。进入90年代,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开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不乏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深刻教训,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应该是一个起点。

1994年3月31日,台湾长风旅行社一旅游团24人乘游轮在浙皖交界处千岛湖游览时,浙江淳安县3名歹徒登船抢劫并纵火烧船,导致24名台胞、2名导游和6名船员全部遇难。此即令台湾岛内舆论哗然的“千岛湖事件”。4月2日,台“陆委会”宣布停止两岸文教交流,并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一时间两岸关系和交流蒙上了阴影。在大陆有关部门向对方披露案情后,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5月中旬以后,台“陆委会”取消旅游限制。然而在此期间,尽管两岸有关机构互动不断,大陆媒体却不见任何报道。

这个事件促进了关于媒体开放的观念变革,使中国官方初步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媒体发达的今天,有意无意地封锁突发事件(尤其是涉外突发事件)的信息后果可能严重到难以收拾局面。

但是,尽管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来源,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形成的不少地方官——商利益共同体成为信息公开的新的压制力量,同时这种力量与一些媒体管理官员“开放媒体会影响稳定”的习惯思维相结合,造成了一种复杂局面。也就是说,利益权衡经常取代观念之争,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因此直到2003年以前,媒体能否报道突发事件,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这种不确定很可能是决策者利益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以2001年为例,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事后中国媒体以空前的规格予以报道和评论,持续近一个月之久,媒体的一大宣传主题是中国对人权的高度重视。而恰恰在这个月,山西和陕西共发生三起灾祸(两起矿难和一起踩踏事故),造成超过百人死亡。可是在媒体上没有任何反映。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81名矿工丧生。事件首先由互联网披露。全国各地媒体冲破阻力得以跟进报道,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所致大灾难。正如200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假如媒体缺席”所言:“南丹特大事

故,通过记者的努力,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铁幕才撕开了一角,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使事故的调查处理步入正常轨道。'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

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03年。人们耳熟能详的孙志刚事件和'非典'事件,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正像这次大地震一样,这种进步是以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从此,政府信息公开和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提上了立法和立规的议事日程。于是就有了2007年11月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今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们因此看到了今年年初雪灾和4月份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中的及时报道,以及媒体就安徽阜阳手足口病对当地政府的质疑。

当然,近期的信息公开也有限制。例如,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生效前后的2007年10—12月,沈阳发生与'蚁力神'公司150亿元集资有关的数万人表达诉求的风波,当地政府没有披露任何关于风波的信息,即便是在互联网上,相关信息也被删除得干干净净。

这就给逐案权衡的媒体管理办法造成了挑战。实际上,国际舆论还是比较常态化的,只要我们开放,人家就认可,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希望我国新闻公开成为法律制度保障下的常态行为,而不是权宜之计,万万不可从已有的进步倒退回去。来之不易的成果是多少人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啊。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努力去谋取有所补偿

● 于光远

1966年邢台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时,我都曾赶到现场。地震所造成的惨痛景象令我至今难以忘却。这次汶川大地震,我无法前往,只能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关注着灾区的情况。我看到这次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救援工作也极为艰巨困难。然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对这次地震的救援工作高度重视,不仅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指挥、慰问受灾群众,而且各级各部门反应速度之快、救援队伍集结之迅速、救灾物资供应之充足,媒体报道之及时透明,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爱心捐助之踊跃……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工作都有效地使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在最大程度上有所降低,同时也使我们国家对这次灾害的救援工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地震是破坏性极大的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至今人类还无法准确预测。然而在这样的灾害面前,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除了加强地震预测的研究之外,在城市规划、房屋建筑质量、地震知识的普及、应急预案的制定实施,包括地震发生后的救援等方面,人们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即可以在防灾减灾上下功夫,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提倡在我国建立一门'灾害经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如何减少不可抵抗的灾害给社会经济效益带来的破坏和损害,如何在灾害发生的损害已经造成之后,努力去谋取有所补偿。"我希望我国的经济学家能在这方面研究中有作为。

我相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全国人民与灾区人民共度难关,灾区的重建工作和灾区人民的生活保障一定会做得很好,灾区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以改革公车制度支援抗震救灾

● 何方

标题上的两件事似乎互不相干,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汶川地震,引起全国悲痛,招来世界同情。这次大地震,造成的灾区之广、灾民之多、损失之重,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单是重灾区就有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无论按面积还是人口计算,都超过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人数就相当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大国的总和。经过半个多月抢救伤员的"黄金救援期"后,现在还面临着灾民安置、防疫、处理次生灾害

隐患如堰塞湖等一些紧急的重大问题。这都说明,抗震救灾的严峻时期并没有过去,甚至还会出现不断反复。所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必需作长期打算,准备连续作战。据国际红十字会修正后的估计,单是当前的救灾安排,就需要 500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5 万亿还多点)。至于说到灾后的恢复和重建,那更是任重道远了。仅以居民住房来说,地震造成的倒塌和不能再住的就有 347 万多户,1476 万多间。不少灾民讲,要恢复到灾前的居住条件,少说也得十年,超过了当年打日本的“八年抗战”。以前唐山重建,起先计划五年,结果还是用了十年(不过再建起来的已经是一个“新唐山”)。这次震灾涉及川陕甘渝,恢复和重建的任务自然会更重更大得多了。

无论抗震救灾还是恢复重建,都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特别是长达十年的重建,需要的资金定不在少数。这次地震,振奋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凝聚精神,也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支援。半个多月来,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为抗震救灾,自觉自愿地捐钱捐物,其情景实在感人。截至 5 月 28 日,国内外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总计已达 348 亿元。今后当然还会不断有捐献和承诺,不过应该承认,高潮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而大量和长期的资金需求还在后头。这除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外,主要恐怕还得靠政府投资。中央也已看到这点,国务院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 5%。上海更进一步,决定市级机关经常性预算削减 10%,还停止新增公务用车。市长号召全市机关公务员厉行节约,把节约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援助灾区人民。

古人云,“大难兴邦”。这次汶川地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振奋民族精神和兴利除弊的改革良机。例如从救灾重建需要钱和上海不买新车的措施,就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在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上读过的一篇思源谈民生财政设想的文章。特别对他提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谑称“三座大山”的“三公”(公费用车、公费吃喝、公费出国)之害,我早有同感。单这“三害”相加,每年达 9000 亿元,对灾区重建所需资金就可解决不小问题,还不烦周处,自己除掉“三害”。这“三害”,社会舆论和两会代表、委员在年年讲,但就是拖

了几十年也除不了。道理很简单,谁也明白,因为这影响到享受这些特权的人的利益。所以过去,有意见、不满意、甚至背地骂娘,也一概任你为之,享受决不丢掉。但那是平常时期,可以既往不究。而现在却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人民公仆,难道就不能和人民共体一下时艰?何况这“三害”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就一定要保持这一并不体面的“特色”?所以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看领导上的决心和气魄。只要上面下决心改变,绝大多数干部是会照章执行的。如果有些人思想不通,那就组织他们学习如何防止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异化问题。党中央不是早就倡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吗?那就先从马列著作如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中编选一本如何做公仆的“干部必读”,让大家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以立党为公为主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难道对正气能够压倒邪气都缺乏信心?当然,也许会有人坚决反对、进行抵制,那也好办,用赞成的人去取代他们的位子就行了。

据思源所引材料,中国的行政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是大国中最高的。以 2000 年为例,中国是百分之 25.7%,而其他几个国家是:印度 6.3%,俄罗斯 7.6%,美国 9.9%,德国 2.7%(为 1998 年),更不用说北欧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了。中国的行政费这么高,就包括着“三公”用费。所以这是一种腐败的象征,对于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是极不光彩的,早就应下定决心,加以改革。现在全国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支援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在尽一切努力。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些反腐倡廉、兴利除弊的事,阻力应当不会太大,政府却可从中筹措出一定赈灾资金。这里单谈被思源称为“公车腐败”的一项,就可看出节省费用并不是小数目。每年全国公车支出约 4000 亿元,如果进行废除公车制度的改革,例如只保留现任正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专车,省部级以下干部取消专车,因公务用车实行实报实销,一年就可节省 3000 亿元,而且丝毫不会影响公务。据财政部报告,截止 5 月 28 日 14 时,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 195.27 亿元,还远不到可能省下来的公车费的十分之一。

应该指出,无论现在的抗震救灾还是今后的支援重建,自然都应主要由政府负责。因为政府的钱是直接间接取之于人民的税收,拿来救灾,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应有之义。中国老百姓大多过分老实,对于政府的救济和支援总是千谢万谢,感恩不尽。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往往以施恩者自居,混淆了纳税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没纳税人的供给,政府不但无法进行救灾和做其他事,就是工作人员连饭也没得吃。继续救灾和准备重建,中国政府还面临诸多严峻的考验,不能不统盘考虑和统筹兼顾,其中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筹措更多的资金。实行公车制度改革,既是一项解除腐败和缓和干群矛盾的盛举,也是克服困难、筹措资金的一个来源。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干呢?多年来,包括每年面对两会的批评建议,党和政府从来没有给予过正面答复,更提不出站得住的理由和有说服力的解释。现在到了应该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末了,我还想说,在这次空前大灾难面前,我们除了响应号召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心怀灾区人民、支援抗震救灾、想灾民所想,急国家所急。要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只说好话、只知感恩,那是对舆论的误导。经过这次大灾,如何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还是进一步退两步、继续弄虚作假、实行官官相护,这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问题。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是否对干部就可以根据现在和过去表现,实行问责制和奖优罚劣,该提升和表扬的及时提升表扬,该批评处分的决不包庇掩盖?也不应限制群众和传媒只能作正面报道和说好话,不得进行揭发和批评。这样做就把灾后出现的好气氛给葬送掉,又回到了老路上去了。又如对那些总是指手划脚、拉人后退、规定说话框框、干扰工作前进的人和机构,是否也应当作些限制,让他们从暗箱中走出来见见阳光?总之,我认为,此国难当头之时,不应限制人们说话,而应鼓励大家献计献策,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有什么不好?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我建议改革公车制度,供领导参考,供大家讨论。

2008年5月30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第七、八

届全国政协委员)

公开透明彰显政治文明和民主进步

● 冯 健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新华社记者随人民解放军乘冲锋舟,而后又登陆徒步跋涉,甚至像“壁虎”一样爬过山体滑坡的滚石,进入地震中心汶川县映秀镇,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了第一篇地震灾区的文字新闻和第一张照片。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开始24小时不间断的关于抗震和灾情的直播,新华社昼夜滚动播发关于地震的新闻。随后,国内各媒体,国际许多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奔赴灾区。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了每天的新闻发布会。由此,“中国媒体对受灾实情上演了一场新闻大战”(《日本经济新闻》语)。

国际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及信息传播的快捷、透明、客观、全面,无不刮目相看,同声称赞。他们说,“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媒体报道及时,信息更加公开”(美国之音),“在中国地震报道中,外国记者获得前所未有的报道自由”(美联社),“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迅速、灵活应付,且出人意料地开诚布公”(英国广播公司),“信息公开的做法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广泛好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不是受到控制而是得到了很多帮助,快速准确的官方信息通过新华社源源不断地传出,各路记者也到现场采访,接受采访的人也直言不讳……这一切表明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悉尼先驱论坛报》)。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分社社长马珍,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就飞往成都,中午又从成都租车奔赴都江堰灾区。她在灾区见闻中写道:“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5月24日上午,她和路透社、美联社、美国CNN与NBC,日本NHK等共13名外国记者,受邀乘军用飞机从成都飞往汶川县映秀镇,在那里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在一片废墟近旁举行的一次特别的记者见面会。温家宝在会上说:“这次救灾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以人为本和开放的方针”,“我们欢迎世界各

国的记者前来采访,相信大家会用你们的良知、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震情、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

汶川地震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是对中国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难的执政理念最具体有力的诠释,这种理念像春雨一样,已经点点滴滴滋润了千万灾区人民的心田。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也使中共十七大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许诺,成为千万灾民心感受的体味,也使多年来舆论机关倡导的“三贴近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党心和民心真正贴近了。可以概括一句话:这次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彰显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民主进步。

这是新闻工作者们在地震灾区的生死场上,突破长期以来惯性管制的条条框框,解脱自身的种种无形绳索,解放思想,夙夜匪懈,打拚出来的一片新天地。当那山崩地裂、血肉国殇的一刹那,灾情就是命令,废墟下面的呻吟就是召唤,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灾区前沿,用手中的笔、话筒、照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海事卫星电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壮怀激烈地传送着党和政府的号令,领导人的贴心话语和亲民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淋漓酣畅地高歌人民军队和灾民的骨肉亲情,描述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坚强不屈、顶天立地的魂魄,以及人性至真至诚的大爱。而这些报道,反过来又变成感动、激励人民众志成城、战胜灾难的伟力。

面对汶川地震,40岁以上的新闻工作者都可能难以忘却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并且从这种记忆中幡然觉醒。32年前唐山遭受7.8级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一个黎明前顷刻倒塌,变成废墟。当时把持舆论大权的“四人帮”,只准发布简短消息,严禁透露灾情。直到3年后的1979年,才公布了这次地震死亡24万人的惨烈事实。5年前,“非典”肆虐中国大地,同样是因为瞒报迟报已如烈火延烧的疫情,多少鲜活的生命无奈地冤死;两名高级官员因此被免职。面对灾害,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无不怀着双重伤痛:一是痛悼逝者,二是作为新闻人束手、无为,职业的使命感使自己心里在

滴血!

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在重大事件面前,公权部门隐秘的信息越多,暗箱运作越是盛行,公众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而官员们寻租谋利的缝隙也就越多。现在,人们有理由提出: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公开透明,应当成为今后的常态,而不要今天涨潮明天又退潮。要有一种机制来保障这种常态。其实,这也是保证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所必需的,也是医治腐败、渎职的良方之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皇历不足法,这也不报、那也不能说的蒙昧主义不可取。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才是弥足珍贵的好东西。有关领导部门不悉能够看重这次抗震报道中的重大创举吗?看来真的需要想一想过去于国于民的得失功过,换一换新思路新章法了。

(作者系新华社原副社长)

历史的里程碑

● 彭迪

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发生的8级地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悲痛,它也触发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华人生死同心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和爱心。

一夜之间,亿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为灾区人民家破人亡的大难悲伤流泪,默哀祈祷,烛光祭奠。人人都想为灾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全国到处看到人们踊跃捐输,排队献血,报名志愿奔赴灾区救死扶伤。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命运的感情和企望把大家凝成一体,谁也不要想把我们的分离割裂。

国家领导人表现了非凡的果敢和效率,以珍惜和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幸福的人道主义精神,率领组织和调度全国的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地震发生两小时后,政府总理温家宝已奔赴灾区,立即成立紧急救灾总部,一连五天,日日夜夜,在前线指挥这场艰险的战斗。他的号召是:“时间就是生命”“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用一百倍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的生命。胡锦涛主席先是坐镇中央,后是深入灾区,指令党政军民,全力以赴,

抗震救灾, 打赢这场攻坚战。十几万解放军官兵、武警、民兵和来自各地数以千计的医生护士, 通宵达旦, 争分夺秒, 奋不顾身。投入战斗, 涌现了许多无名英雄, 创造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奇迹。人们似乎回到了民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领导和群众、军队和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抢险救人的阶段告一段落。但善后工作更加复杂艰巨, 是另一场长期的攻坚战, 还需要全国军民尤其是领导以深厚的爱心, 坚强的意志, 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精神, 继续团结搏斗, 直至全胜。一个既有领导又是自觉的全国全民性的支援灾区规模巨大的人道主义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 为灾区人民医治创伤, 渡过难关。全国有关的工厂企业, 交通部门, 各行各业都在突击生产, 陆运空投, 加快速度, 源源不断给灾区运送急需的食物、饮用水、生活用品, 临时安身的帐篷, 卫生防疫治病养伤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等。灾后重建家园的工程也在规划和开始动工。神州大地, 一片紧张忙碌的气氛。负责这项艰巨工程的温总理一再回到灾区部署检查工作进程, 心连心地为灾民排忧解难。胡锦涛总书记也到各地检查督促有关工厂支援灾民的工作, 不时回到灾区慰问和视察, 表达党中央对灾民的关心和众志成城战胜灾难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次大地震中,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开放的方针, 欢迎、感谢和信任世界各国真诚慷慨的物质技术援助和派出的许多勇敢的抢救组和医疗队到现场参加救灾, 而且打开大门让许多外国媒体, 深入内地, 自由采访, 不怕暴露自己的问题和弱点。特别明显的是温总理 5 月 24 日站在重灾区山坡上举着扩音话筒用显然已经过度疲劳的声音向上百名中外记者坦诚地介绍灾情现状, 说明解决了哪些问题, 还需要做什么, 困难在哪里, 还有什么危机, 特别关注防疫防洪等次生灾难。这次讲话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严重挑战敢于面向世界开诚布公和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决心。正如温总理指出: 地震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 “相信国际媒体会用你们的良知, 人道主义精神, 公正客观, 实事求是地报道震情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他向全世界再次宣布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

中国新闻媒体的工作者这次打破清规戒律, 独立负责, 千方百计, 深入现场, 不畏艰险, 争分夺

秒, 以最快的速度, 真实透明地记录和反映了这场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拼搏。每天 24 小时的电视把全国人民和国外视众带到现场, 左右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鼓舞着人们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过去, 对这种重大事件的报道, 少不了事前由宣传部定调子, 划框框, 报什么, 不报什么, 强调什么, 用哪些套话, 如此等等。这一次, 管制宣传的要员们远离灾区, 鞭长莫及, 记者们有了独立负责, 自由发挥才华的机会, 在反映这场斗争的实况中起到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内受到高度评价, 在国外也誉满全球。

通过中国的这种放手开放的方针, 世界目睹中国领导高度负责, 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 指挥若定的能力和反应迅速的效率, 中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军警战士坚强不屈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 以及中国媒体深入采访和放手报道所体现的忠于事实和自由开放的新面貌。许多国家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他们中间有人原来以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不讲人道主义的政治动物。现在他们正在探索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一贯被某些高傲的西方人士妖魔化的中国人也开始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少一点委屈感。这点安慰来之不易, 是我们中国人在苦难中用我们的血汗生命在拼搏中得来的。

很久以来, 在中国没有看到像这次应对地震灾难时表现出来的这种上下一心, 全民团结, 共赴国难的局面了。在这种非常时期, 大家的感情是相同的, 利害是一致的, 思想是沟通的, 行动是各尽所能互相配合的, 关系是平等的, 作风是民主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广大群众公民意识的提高相结合, 反映了中国的软实力与日俱增, 正在改变着中国国内的政治面貌。

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这次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深入的关键时刻。经济上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就, 显示中国的硬实力的增强。但象征着软实力的政治改革还处在准备阶段。这次大地震, 逼上梁山, 不仅显示了中国应对紧急危机的硬实力, 而且无意中反映了中国人软实力的潜力不小, 让我们感到欣慰。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的软实力往往是在面临巨大的自然灾害或外国的侵略欺凌的情况下逼出来的, 要这种软实力变成全民族自觉的公民

意识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在政治改革中培育建立和增长。回顾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有力地说明这个规律。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硬实力大大不如日本,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靠民族觉醒,国共团结,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勇气和毅力。又例如,在30年改革开放中,前一阶段的经济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较顺利,而下一阶段的政治改革要一部分人分权让利就遇到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和贪污腐化分子公开的和暗藏的阻力。他们害怕反映国家和人民软实力的普世价值观如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尤其害怕新闻开放言论自由。

问题是,新闻报道实事求是和言论出版自由开放是衡量一个政府是走向民主还是保持专政的最明显的试金石。它表明政府尊重和相信人民,至少让人说话,欢迎人民提供各种信息,发表各种意见,可以对政府诉苦,求援,表扬,批评,建议,监督,揭露渎职无能的官员,而不致受到限制打压。它也是解放思想,发挥人民的智慧潜力和改革创新的必由之路。中国迟迟没有实行这种开放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疑惧和见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中国媒体对地震报道的自由开放,国内国外反应热烈。但愿这是中国领导的长远方针,不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期待的心情,拭目以待。

《芝加哥论坛报》5月18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必定已经看到,信息自由流通并不会导致混乱,它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位德国记者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必须让人相信它的经济,相信它的政治,相信它的媒体,相信它的文化的世界性质。”

地震强烈震撼了世界,也惊醒了中国。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中国!加油!”的呐喊,响遍神州大地。这应该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地震灾难,继续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因势利导,开始推进政治改革,充满信心地大声向全国和世界正式宣布开放舆论的良好时机。

果能如此,我国这一代领导将作为中国解放以来最杰出的政治家而载入中国和世界史册。而这次造成中国苦难的地震可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和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

警惕以悲情压制反思

● 张 鸣

无疑,政府在此次抗震救灾中,表现不错,体现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以人为本,开放透明”。抗震救灾,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改善政府形象,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中国政府能抓住这个机会,借抗震中跟群众和外国媒体的良好印象,唱一出借东风,进一步推动自身的改革,自身良性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另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仅仅把救灾时的“以人为本,开放透明”,作为一个特例,事情过去,则一切照旧,甚至后退。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上看,后一种的可能性还相当大,具体表现为某些部门利用人们在地震灾害中的悲情,利用人们对救灾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的感动,压制不同意见,尤其是抵制对灾害和救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当然,前幾天,在抗震救灾最紧急的时刻,救人要紧,反思可以放一放,但是,到了今天,进入灾后重建过程了,依然不许对在灾害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病,以及各种负面因素进行反思,显然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们看到,不仅有的部门禁令三申,而且对于某些媒体的所谓犯禁行为,进行批评处理,依然只许感动,不许反思,人们对灾情的悲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压制意见表达的最好借口。

事实上,开放透明的基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是像我们某些领导人说的那样,是以人民为本,而是以个人为本。因为人民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如果以人民为本,而抽掉具体的个人,那么所谓的人民,就变成了一种没有具体内容的符号,最终很容易导致借人民的名义,牺牲掉一个个具体的人,那么人民也就等于没有了。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实在太多了。开放透明,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发言权,不仅顺耳的话要尊重,有道理的话要尊重,不顺耳、没有道理的话也要尊重,其背后,就是以人为本,否则,就无所谓开放透明。我们可以批评那些我们认为不适当的言论,但不能封杀,只要允许以某种标准,封杀不顺耳或者说没有道理的言论(有意造谣除

外),那么就意味着部分的不开放,不透明,时间一长,最终会导致整体的封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

● 钟沛璋

一、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生命。怎样善待每一个生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明确了必须‘以人为本’。在实践中我们做得怎么样?为什么西方国家总质疑我们的‘人权’?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迅速奔赴灾区,喊出了‘只要有一丝生存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倍努力’。人们从电视和照片中看到,拯救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国家倾全国之力,十数万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无数白衣天使和志愿者,历尽艰险,奋力挺起了生命方舟。这就是大灾难中,今日中国的回答。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这是沟通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普世价值的世界语言。在中山陵前,我们看到中国国民党主席举起八个大字:‘天下为公,人民最大’。这表明我们两岸同胞的语言和心是相通的。这使我们看到祖国统一的希望和途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年代就说过:‘我们要统一,不是统一于专制,而是统一于民主。’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正是民主的核心。

二、把信息公开透明坚持到底

可以把近三十多年来三次大的灾害作个比较。一次是唐山大地震,到底死了多少人,外国记者是七年之后才被允许到唐山采访。因为封闭,世界各国对唐山地震援助也无能为力。

第二次2003年的‘非典’,最初因为不敢公开透明,出现谣言和混乱。一些地方为防止‘非典’向自己地区蔓延,甚至割断了公路交通。

第三次‘5·12’大地震,信息的高度公开、透明,人们看到至少有四大好处:

1、激发全民奋起抗震救灾,迸发强大的民间力量和公民意识。

2、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空前增强,党心、民

心,结成一心,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对接互动,高度的和谐、团结。

3、使世界看到了一个自信、开放、有高度人道主义爱心和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大国,增强了对中国的尊敬。

4、消除了谣言,保证了社会安定。

事实表明,保证人民有知情权的民主权利,是激发公民意识,形成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础。

这次大地震中信息公开透明的良好局面是国家领导的正确决策。温家宝总理邀请中外记者乘军用直升机到灾区山谷,接受采访提问,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公开透明的坦诚态度。

这次信息公开透明的良好局面也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冲破种种限制的主动精神形成的。许许多多中央和地方的记者,直奔灾区。哪里有不畏艰险的战士,哪里就有不畏艰险的记者。在电视台和电台连线直播中,记者提供了大量感人的报道,迅速准确地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全国人民和世界。中国的记者、媒体工作者在抗震救灾中立了大功。

三、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从此开始

抗震救灾以来,收到了国内外大量的救灾物资和捐款,能否保证这些捐款和物资用到灾区和灾民身上,切实做到廉明赈灾,是当前国内外共同关心的一个焦点。政府和有关组织部门,都已采取了一些监督措施。毛泽东在1945年著名的‘窑洞对’中,就对黄炎培说过:‘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建立切实的监督机制,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一个焦点。人们强烈要求,从廉明赈灾开始,把我国的监督机制切实完善起来。完善的监督机制是消除腐败的保证。‘人人起来负责’,就要有公开的舆论监督。不能要求报纸、新闻媒体总是‘报喜不报忧’,把‘悲剧演成喜剧’。揭露救灾帐篷被非法挪用,不正是对廉明赈灾的有力推动吗?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明天,太阳将重新升起。在新升起太阳照耀下的中国,一定是新的更美好的中国。

(作者系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

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人！

● 袁 鹰

2008年5月19日下午2时28分。全国响起了震人心弦的警报声。全国旗杆上的国旗冉冉降下半旗。

中华民族五千年青史上空前一次伟大的行动：全国人民为平头老百姓的大苦大难致哀。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漠河边城到南沙群岛，从中央领导人到幼儿园儿童，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同时肃立低头。无论是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或是人烟寥落的山寨荒村，无论是机器轰鸣的矿山工厂或是书声朗朗的中小学课堂，无论是波涛万里的海疆舰艇或是冰雪覆盖的边防哨所，这三分钟里，都将所有的爱心飞到灾区，都将滚滚热泪洒向灾区，洒向我们的血肉同胞，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曾经哀伤地吟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悠长的发展史上，曾经遭遇过数不清的天灾人祸，正是在数不清的劫难中，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磨砺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七十年前，强敌入侵的危急关头，我们全民奋起慷慨悲歌共赴国难。今天当又一次山摇地动的大灾来临的时候，苦难的同胞没有倒下，我们民族没有倒下！

巍巍昆仑，傲然屹立。我们看到：哀悼三分钟刚过，自动聚集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人群齐声高呼：中国，加油！中国，加油！这正是全民族的心声！霎时间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结成一道新的万里长城！一声令下，解放军立即千里驰援，奔赴灾区，武警救险部队、公安消防部队、空降兵直升飞机到一处处满目疮痍的瓦砾堆中，去搜寻营救幸存的遇难者；战士们民警们扶老携幼，沿着阻塞的山路和已经没有人烟的村寨一步步下山；在连续发生的四、五、六级余震和风雨阴霾的多变气候中，冒险修复被阻塞的山路。成都军区抗震救灾队一架运输直升机，送一批专家和救援人员去理县返回途中遇到突变的恶劣气候不幸失

事，坠落深山荒谷密林中，虽经仔细搜寻，终于发现全部遇难。使我们沉重的心又增添一份铅一样沉重的哀痛。他们身上，又一次体现我们民族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正气歌》）

莽莽神州，蕙风和畅。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最广泛的发扬，最强固的凝聚，最美好的闪光。几天之内，四面八方伸出手臂，敞开胸怀，捐款捐物，慷慨解囊，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幼小儿童，远及海外赤子，万众一心，义无反顾。近一个月来，我们每天从电视荧屏上看到数不清催人泪下的场面，每天从报纸上读到数不清感人心弦的故事。子弟兵连续奋战十几甚至几十小时，从瓦砾堆中抢救被困的乡亲，只要发现一个孩子、一位老人，还有一分希望就决不住手。老师在楼倒房塌的瞬间，顶住门框，争分夺秒掩护学生撤离险地，救护人员发现一位老师的遗体时，他还张开双臂伏在讲台上罩着生还的学生。白衣战士们细心地救死扶伤，还给过生日的小病人送鲜花蛋糕。自动赶到现场的志愿者，冒着余震，奋不顾身救人搬物，送饭递水不留姓名。人人真情流淌，人人沐浴在温馨和谐里，浩浩荡荡，大爱无边。

绵绵细雨，润物无声。“以人为本”的信念得到最充分、最生动的体现，成为每个党员干部行为的基本准则。党中央总书记在大震袭来的第一时间，就作出立即全国动员抗震救灾、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指示；国务院总理几小时之后就出现在震中现场，号召全力救人是所有抗震救灾行动中重中之重；举国上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各行各业，心向灾区，情系灾区，奔向救灾第一线，救人，救人，救人！人的生命无价，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号召和安排，一切行动和规划，一切心血和汗水，都是为了人！为了人，总书记和总理几次深入灾区察看灾情；为了人，基层的支部书记和乡长、村长日以继夜指挥乡亲转移脱险，全不顾自己的家人还埋在废墟中；为了人，火车、汽车、飞机昼夜兼程将各种物资火速运往灾区；为了人，数不清的帐篷、木板房争分夺秒地在废墟上建立，让灾民尽快有了安歇地；为了人，科学设计人员日夜辛劳，仔细为重建城镇选址；为了人，军民抓紧时间抢种抢收，运出能收到的农产品，为灾民增加

收入;为了人,一批批受伤同胞运到重庆、昆明、济南、上海、天津、广州最好的医院治疗,一批批中小學生送去外地最好的学校继续上学;为了人,一批专业心理医生细心地为家破人亡的父老和儿童抚平心灵的创伤,守住生命,守住希望……我们虽然不能去到抗震救灾第一线,但是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以人为本’那高亢的、激昂的声音。人的情义,人的价值,人的信念,人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生命的力量无穷无尽!

遥望川西北、陕南、甘南抗震救灾战场,我们衷心地成千上万排除万难为抢修道路、从陆路、水路和空中抢救伤员、运送食品衣被药品和日用品、安装建简易住房、安排受灾同胞生活让他们重新有个温暖的家、架起帐篷小学的解放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医护人员和四面八方来的志愿者,向为孩子们能继续得到书声笑语的老师们,谨致深深的敬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形象。尽管根本不知道你们绝大多数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天天为你们热泪盈眶、心潮起伏,为你们的英雄行为感动、感奋,因为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个个都无愧于大写的——人!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比较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的报道

● 张广友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地震发生。我骑自行车六点到到了新华社,发现记者们正四处打听消息,搞不清震中在哪里。当时新华社的文教记者顾迈男是专门负责跑国家地震局的,她在早上6:20从国家地震局发回来消息:据沙河地震大队从河北蓟县来电话说,唐山市基本上已经成为废墟,90%的人被压,这才知道震中可能在唐山。地震发生近三个小时后,新华社才发了内部消息。

知道震中后,我赶紧向领导报告,要了一辆小轿车,和几位同事一起就出发了。当时也就是早上7点钟吧。到唐山是当天下午6点多钟,属于最早到唐山的那批记者之一。但是,我关于唐山地震的见闻,1982年才发在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上,顶多算是半公开发表。1986年,这个报道才公

开发表,当时我已经调到《农民日报》工作,是以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的名义发表的。题目叫《抹不掉的记忆——唐山地震当天见闻》。

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新华社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就发布了消息。当时我就感慨,这和唐山大地震比起来,政府通报消息快多了呀!

唐山地震时,我们国家是一个外援也不要。当时的地震我们报了7.8级,有人说是8级。去唐山慰问的领导就讲:“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那个时候强调自力更生,因为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给人道主义救援也打上了阶级烙印,把人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过去老怕外国人进来刺探情报、搞颠覆,有灾情消息也不敢发。

这次大地震不但接受了国外的物资援助,还允许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进来。接受外来援助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面临灾难,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存权,这才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这次四川地震的震级从7.8级修订为8级。在整个报道过程中,基本上保证了公开透明,得到了国人的拥护和世界的好评。

唐山地震之后,记者发稿有很多限制,不让说死人,死伤数字也不让说,只让说救灾。而且,主管宣传的姚文元明确指示,关于地震的公开报道在总量上不要超过15条。当时还提出一个口号,叫“抗震不忘批邓”,还要在救灾前线搞阶级斗争。当地老百姓好不容易找了纸板,写上批邓的标语,拍了照片后发回北京。

不光唐山大地震,那时有很多自然灾害不允许公开报道,比如1975年的淮河大水灾,但不允许公开报道,还不让飞机飞过灾区上空。就是为了瞒住灾情。

很多时候,这些做法容易掩盖问题的根源。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时,才公布于世的,死亡24万多人。这时,地震已经过去三年。

这次四川地震中的信息发布很及时,每天都有灾区的最新信息,每天都公布死伤人数。这都显示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作者系《农民日报》原总编辑)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 李 锐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 and 《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口中四百分之

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

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

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特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

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

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

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

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

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內,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

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责任编辑 杜晋)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

——1953年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始末

● 靖 鸣

这是一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极其重大和敏感的新闻史事件。1953年3月4日,中共广西省宜山地委机关报《宜山农民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在报社内部以及报社与地委之间引起激烈争论。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严格地说党报与领导它的党委不是同级)?广西省委宣传部就此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3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示,党报“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就是新闻界惯称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来历,这条规定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必须遵守的“铁律”,一向为理论界和党政、立法、司法界所关注,然而事件本身却鲜为人知。

《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事件涉及到舆论监督有无禁区、舆论监督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问题,关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政治文明、惩治腐败、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政治问题。这一事件当时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陆定一等高层领导的注意和批评,对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推翻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建立的批评报道事后追惩制,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中央改变了对新闻批评的态度和政策。

笔者通过调查考证发现,这一已作定案处理的历史事件,当时在调查处理时,有些情况有出入,有的定论有偏差,比如该报在刊发社论前是经过请示的,并非“未经请示”。这就有可能存在中央宣传部是在广西省委宣传部提供的不准确事实和不正确结论之下,未作调查匆忙作出指示的问题。这一事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么其内情到底怎样呢?

一、《宜山农民报》事件的时代背景

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记者编辑(实际是编辑部——笔者注)负独立责任,放弃了过去的批评报道刊前预审制,确立了批评报道的刊后追惩制,给新闻批评提供了一个舆论空间和有利条件。这是1950年下半年至1953年初这段时间新闻批评开展得相对较好的重要因素。在全国的报刊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些领导人还就此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刊发多篇社论,并不断检查督促各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3年元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二、《宜山农民报》批评一县委书记及在相关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

《宜山农民报》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报纸上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该报为周三刊,每期都辟有《读报人来信》专栏,刊发数篇读者来信,还经常将重要的批评稿件另发在显要的版位上,记者也采写少量批评报道。尽管如此,批评报道开展得仍然不理想。据统计该报从1952

年9月到1953年1月,共收得批评稿350篇(批评农民的不在其内),在报纸上发表了34篇,来信检讨的只有14篇,转有关机关处理的316篇,来信答复的只有138篇。这些情况说明报社批评稿发表得太少,犯了软弱病,放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好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该报编辑部决定加强这一工作,并且在编辑部干部中作了初步的思想检查。

宜山农民报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一事件是由当时的宜山专区象县县委书记祖××违法乱纪事件(因事件发生在象县的罗秀圩,事件又由祖××引起的,所以史称“罗秀事件”或称“祖××事件”——笔者注)引起的。这里以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3年6月23日《关于处分前中共象县县委在罗秀整干会议中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处分决定》)所作的案情介绍和结论为据,简略介绍“罗秀事件”的经过。

1952年3月29日,前象县县委响应上级整党整风号召和部署,将县里干部集中在本县罗秀圩,开始复查干部问题。30日,县委组织部部长秦×作大会动员,号召大家开展反右倾斗争,提出“从县委开刀,层层下水”;“大胆提意见,敢提的,可以酝酿串连”。

县委书记祖××在有关会上“严厉指示”:“哪一中队哪一小组意见提不上来,就是领导不力,要撤换领导。”第一次公开检讨时,他号召:“大胆揭发领导上的错误,坚决向错误作斗争!”但由于祖自我检查不深刻,特别是检讨到他的个人问题,“小声小气连说带哭”,谈了几句就过去了,与会基层干部一致不满,要求其再检讨。4月1日祖再作检讨,但仍通不过,与会者要求其作第三次检讨,并要求其他县委委员也要作大会检讨。归纳与会者对县委的意见共四点,主要是个人婚姻和生活作风问题:1、祖××与刁××谈恋爱,与原妻张××闹离婚,违反《婚姻法》,影响复查工作。2、县委无原则,互相包庇,如互

相批准对方离婚等。3、祖工作“不艰苦”,下乡借贫雇农棉被说“有虱子”不盖。4、罗秀会议上,祖宣布不准下乡干部吃米粉,但县委却吃面加荤。与会者提意见的动机,“主要是响应县委号召,整顿领导改进工作,也有写批评县委稿件被压制打击而夹杂个人意见的,加上祖检讨不深刻,平时对干部冷酷无情,长期积压,有了机会,就爆发出来。”

4月2日,组织部长秦×在一次会上提出要扣押坏分子。4月3日,县委委员李××在一个会上提出,“有坏分子要打垮县委,要打垮共产党,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坏分子。”秦×在另一会上宣布:“有坏分子在内破坏我们的党。”有人主张逮捕法办有“历史问题”的两个人,县委当即同意。当场将两人扣押起来。会上又揭发另一人,也当即被绑起来。县委随即号召大家有受骗上当的把名字报上来,宣布要将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管



当年《宜山农民报》发表的调查报告

制起来。于是各中队提供名单,有15人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有“反党活动”。连续三天,采取农民斗地主的形式,将其管制起来。被管制的15人中有12人是党团员。被怀疑为“特务”的20人中,有17人是党团员。其中被打击最厉害、管制最严的,就是对县委特别是对祖××提意见最多的县妇联组织部部长黎瑞芳。她被当场捆起来,押在戏台下的牛栏里,和十几头牛放在一起,后改押到别处。共押两夜一天半,黎被逼得几乎自杀。另一被认为最反党的,是常写批评县委和祖××稿件的通讯员林荣章。祖××四次与其谈话,逼林承认反党。林写了承认“反党”的反省书后,4月7日上午被解除管制。这次会议,共扣押4人,管制15人,报“受骗上当”者达与会者总数的70%,有一人被判处劳改,两人因特务问题搞不清,扣押到1952年8月才“解放”。被管制的,反省后仍有4人被处分,但“反党活动”帽子未摘,档案中还有“反党”材料。

这一事件在当地反应强烈,由于当时的柳州地委认为事件没有反映得那么严重,仅派与案件查处无关的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谢之雄调查过此事,且与犯有错误的该县县委商量如何处理此一事件。此前宜山农民报副社长刘国正也从编辑部得知了一些祖××违法乱纪问题的情况,便安排群众工作组副组长杨炎下去调查采访。杨炎经过调查,写出长篇报道,题为《对中中共象县县委书记祖××的离婚和因而产生的种种事件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刘国正看了《调查报告》,愈发气愤,他认为地委存在包庇祖××等人的问题,不会认真处理此事,觉得祖××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与地委包庇和官僚主义有关,既然如此,按照1950年《中央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当年1月《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精神和《人民日报》当年2月12日“报纸工作述评”的精神,根据新闻总署办公厅1951年11月编印的《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首篇文章《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一文的精神,必须以言论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批评,以引起地委的重视,促进问题的及时妥善解决,便决定为这篇报道配发社论,于是安排过

伟执笔撰写社论。

过伟是写社论的快手,他根据刘国正的意见,很快撰写了题为《把不能见天的事情拉到太阳底下来》的社论。

社论和《调查报告》的布局一样,首先批评祖××违反《婚姻法》的错误,与此同时,还点名批评前象县其他县委委员的错误,接着,辛辣尖锐地批评祖××及县委委员们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社论最后两段对祖××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加以评论:“那么这些情况,领导上是不是不知道呢?不是的!前中共柳州地委是知道的,今中共宜山地委也知道,只是没有很好进行调查处理。不论地委在主观上有没有姑息犯错误的干部,在客观上是纵容了干部的错误的。本报今天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张××同志的《祖××为什么和我离婚》两篇文章,并且发表社论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敦请领导上重视这个事件,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署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应进行调查、严肃处理,并在报纸上公布处理结果。一个是公诸人民群众,使大家了解此一事件之真相及其原因。这样严重而恶劣的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发展,除了上级领导机关之官僚主义,还因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与监督没有展开,在报纸上公开的批评没有展开,没有把这些坏人坏事拉到太阳底下来!”

三、《宜山农民报》刊发的批评宜山地委的社论经过审批

《宜山农民报》事件有个关键性的细节需要考证,就是该报刊发批评地委的社论是否请示了地委。这涉及到后来地委、省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对“宜山农民报事件”的事实认定和定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有六种说法:

第一种是刘国正本人的说法。刘国正在被打成右派后的一份辩驳材料中说:“当时所以敢于这样做是苏联的《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一文的精神影响的,再说这篇社论在版样上经过代表地委审查版样的地委办公室的同志王升阶同意了,所以没有给我处分。”他在另一份材料中

说：“王升阶代地委处理日常事务，社论经王审过，又请示过阮庆（地委宣传部部长），阮未反对付印。”这种说法，得到副总编辑杨树森和这篇社论的撰写者过伟的印证。听了王升阶和阮庆的意见，刘国正认为地委已同意刊发，遂刊发长篇《调查报告》和社论。关于这个问题，离休前曾担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和广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当时任宜山地委副书记的区济文对笔者说，这类事情不会拿到地委会集体讨论，宣传部长代表地委行使职权。刘国正是经请示的。如果阮庆认为决定不了这件事，他可以向地委书记汇报。地委并未接到阮庆或王升阶的请示汇报。

第二种是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宜山农民报社社长阮庆的说法。事后，阮庆在给广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信中说：“当时地委委员都不在家，只有王升阶同志（代处理地委日常工作）在家，王听说要发表这个消息后才问了一下刘国正。但刘说已排版准备付印。王听了这个问题，即电话告诉我。我同王讲，这个问题地委已了解一些材料，但不全面，下面反映材料据陈专员说事实还有些出入，并请王转告刘要同地委纪检会联系一下，必要时请示一下石堂同志（宜山地委书记——引者注）再发表。但刘认为报社已派人去调查，事实没有出入，仍决定排版付印。”当晚，阮庆“又用电话直接同刘联系，但刘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发表。”这是阮庆反映的情况，至于阮庆本人是否同意刊发，信中未交待。但从事后广西省委纪检会的调查处理决定看，阮庆的信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种是广西日报社的说法。广西日报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当宜山农民报社编辑部向阮庆请示可否发表这一新闻时，他说：‘现在发表是早一点，但你们自己处理吧，不然我怕会是压制民主。’而当报纸刊载之后，又来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第四种是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说法。该委员会在后来的《处分决定》中说：该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说明刘请示过，只是“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而已。

第五种是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的说法。该部1953年11月4日在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汇报宜山农民报事件时说：“王（升阶）得知农民报要发表这一调查报告与社论后，觉问题牵涉太大，打电话往乡下报告地委宣传部长阮庆同志。阮即在电话上与副社长刘国正同志谈，叫对此事要慎重些，发表要全面，并说农民报下去调查的材料可能与地委纪检会的材料有出入，叫向纪检会要材料来对，必要时还可请示地委书记石堂同志，但没有肯定可发或不可发。刘请示阮意见，阮答说：‘我可不敢压制批评。’就这样，报社（1）认为下去采访调查得来的材料很充分，与纪检会的材料无甚出入。（2）为了配合运动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3）平时地委没有看大样的制度，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了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审查，也不明确。于是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便在三月四日发表了。”这里“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也表明报社还是向地委代理负责的同志请示了的。“未很好”大概是指请示的方式、程序不正规、不符合要求，以及未得到合法的书面认可。

第六种是笔者多次向该报原副总编辑杨树森同志调查了解的情况，据他回忆，社论经编委会讨论修改过。他同意社论观点，并同意刊发。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尽管中央有决定，报社有权处理批评报道，刘国正还是将社论送审了。

经以上考证，笔者倾向于社论是经过请示并同意刊发的。并且在地委没有看大样的制度之下，请示地委，是一种组织性、纪律性强的表现。

四、批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的分歧意见

《调查报告》和社论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该报原总编辑沙君涛向笔者回忆说：“报道和社论在专区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当时专区有些干部对他说：‘你们这样搞是不是太猛了？’但大多数干部表示支持报社的做法。”报社在短短几天，收到40多封读者和通讯员来信，他们选了两封信于3月13日刊发。然而报社党委和部分干部之间对此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报社党委”意见以宣传部长兼农民报社社长阮庆和社论作者过伟为代表，认为《宜山农民报》不能批评地

委,但可以批评地委的部门和成员;第二种意见以刘国正和副总编辑杨树森为代表,认为地委确实存在官僚主义,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人民日报》述评和苏联《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精神,认为批评报道和社论可以批评地委和地委成员,何况他们还是经过地委审查的;第三种意见以沙君涛、杨晓雄等人为代表,认为《宜山农民报》既不能批评地委,也不能批评地委部门和成员。尖锐对立的是第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

与此同时,阮庆将报社在家的采编人员集中到宣传部,严厉地批评报社无组织无纪律,报社的人大都心里不服。宜山地委宣传部通过电话向省委宣传部反映了《宜山农民报》刊发批评地委社论的情况。

从一些档案材料看,地委在文字上是支持报社揭发祖××事件的,但不同意报社对地委的批评。3月11日,地委在“弄不清同级党委和同级报纸批评问题”的情况下,决定在《宜山农民报》上先作一个“简单检讨”,全文如下:

中共宜山地委对祖××事件的意见

一、关于祖××同志的婚姻问题与处理反党事件,过去已经柳州地委派人调查处理。

二、柳州区与宜山区合并后,我们收到关于此问题的一些反映,并已作了一些调查,由于我们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故未及时处理。

三、为了贯彻中央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指示,我们已继续派人深入调查处理,并望大家起来大胆揭发、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事件。

中国共产党宜山地方委员会
三月十一日

同日,中共宜山地委宣传部部长阮庆以个人名义,给广西省委宣传部贺亦然部长和史乃展副部长去函,汇报《宜山农民报》关于祖××问题的报道和社论在报社内部的不同意见。信中谈到过去的柳州地委和现在的宜山地委都调查过祖××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这里地委是存在有官僚主义,处理问题不及时”。并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反映报道和社论采写刊发经过,以及报道和社论存在政策法律的问题。

五、广西省委宣传部《关于党报

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的请示》与中央宣传部的《复示》

广西省委宣传部接到宜山地委宣传部关于《宜山农民报》批评地委的汇报后,未对事件本身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仅从党委会与机关报组织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党报不应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但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的部门和党委成员。然而他们又找不到中央的明文规定,吃不准有关政策问题,于是决定向上级党的宣传部门请示。

3月12日,广西省委宣传部就《宜山农民报》的问题以《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为题,发电文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全文如下: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

中南局宣传部并中央宣传部:

《宜山农民报》写了社论,在揭发一县委书记错误时批评了地委,这样做有的认为不恰当,也有人认为是允许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报纸上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如同级党委会有错误,同级党报是不应该直接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而应该向上级党委或党报编辑部控诉,如同级党委委员个人,或同级党委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是可以报纸上直接批评的,这样是否恰当,请指示。

广西省委宣传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一个星期后,中央宣传部对此作出批示,题为:《复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函头为:“广西省委宣传部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宣传部”这一《复示》收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标题变为《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去掉了函头,另外,内文上稍有变动,但意思不变。这里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的文件,全文如下:

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

关于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批评宜山地委一事,我们认为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

与党委会对立。党报编辑部如有不同意见,它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提出,必要时并可向上级党委、上级党报直至中央提出,但未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是一种脱离党委领导的做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由党委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报纸编辑部的责任是:一方面不应在报纸上重复这种错误,另一方面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直至上级党组织揭发这些错误。报纸编辑部即在上述情况下亦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这是党报在其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行的原则。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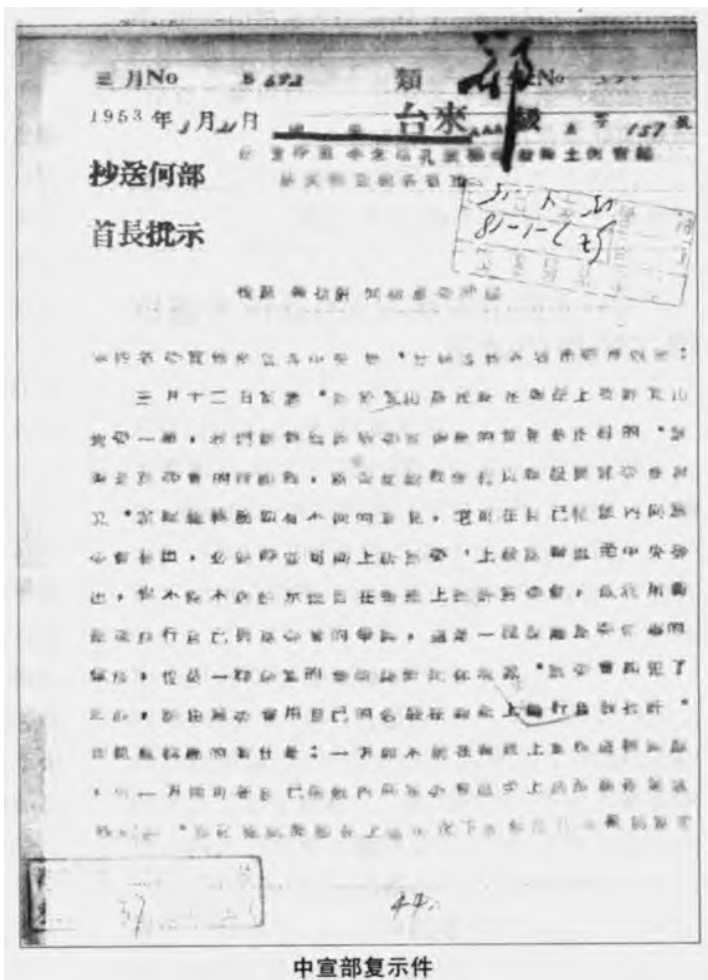
六、人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和广西日报社对宜山农民报事件和宜山地委、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

4月8日,人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曾以书面形式对《宜山农民报》报道祖××事件提出意见,认为:“《宜山农民报》根据群众的揭发和记者的调查,发表祖××违反婚姻法而引起的侵犯人权事件是对的。”认为点干部的名字过多不妥。指出中共宜山地委“在事件发表上也不是积极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仅是抓住《宜山农民报》报道祖××事件宣传中的某些错误给予通报,指出宣传中的缺点是必要的,但对该报敢于在报纸上批评、揭发祖××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主要正确的一面,毫无支持。”中共宜山地委、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压制批评,听任批评者遭受报复迫害的表现。由于领导上这种态度在过去助长了祖××错误得以发展。在现在《宜山农民报》批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助长了祖××不作迅速公开的检讨。”

次日,广西日报社编委会就宜山农民报事件向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纪检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宜山农民报》对祖××

“展开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却是错误的,宜山地委对《宜山农民报》的领导是有缺点的。”广西日报社编委会在“意见”中说:“省委宣传部的通报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祖××事件的报道中,关于婚姻问题部分的错误是正确的,但没有同时指出,揭发祖××的违法乱纪却是正确的。”宜山地委对《宜山农民报》领导是有缺点,不但对报社编辑部没有经常的政治和业务的指示,而且在遇到像揭发祖××严重犯法的重大事件中,地委宣传部长阮庆采取完全自由主义的态度,当报社编辑部向他请示可否发表这一新闻时,他说:“现在发表是早一点,但你们自己处理吧,不然我怕会是压制民主。”而当报纸刊载之后,又来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七、广西省委纪检会对祖××、宜山地委、《宜山农民报》刘国正问题的定性及处理



中宣部复示件

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53年6月23日作出的《处分决定》中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指祖××事件——引者注)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在分析其错误根源时指出:“地委对报社政治领导薄弱,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阮庆不看大样,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看,也不明确,加上片面理解195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中,严肃批判各地报纸编辑部的软弱性一点——不敢独立负责发表批评稿件——因而造成刘国正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的思想基础。”宜山地委的缺点在于:“对报社政治领导很差,看大样在3月4日前一直由刘国正负责,造成这次报纸在报道上的错误。”另外指出,阮庆在事前模棱两可,事后推卸责任的错误。《处分决定》指出,“地委在处理祖××问题上,有姑息迁就情绪。”在第一次处理决定中,准备给祖以警告处分,并降为县委副书记,其他县委不处分;第二次处理决定中只给祖警告处分。对刘的处分存在过重的偏向。”

1953年7月8日,《宜山农民报》全文转载刊登在《广西日报》上的《处分决定》。

八、《宜山农民报》的批评报道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笔者认为:《宜山农民报》对地委存在包庇纵容犯错误的干部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是正确的。报道和社论刊发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致使违法乱纪的一批干部在较短的时间内受到了查处,一批被打击报复蒙冤的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

这一点我们从上文和本文中提供的几个事实可以说明问题。一是地委自己在“简单检讨”和“初步检讨”以及相关汇报中都承认、检讨自己确实存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二是对于如此重大的违纪违法现象,地委仅派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组织部去调查,仍然是不慎重的,且问题久拖不决,引起了民愤,也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中共广西省委纪检会在对罗秀事件的《处分决定》中也指出

地委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

批评报道和社论刊发后,地委很快承认错误,也在有关材料中指出地委支持报社批评。这一事件由于报社的及时揭露,致使地委和省委高度重视,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将罗秀事件彻底查清,并作出处分决定。如果没有《宜山农民报》的大胆揭露和舆论监督,罗秀事件和祖××的问题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比较圆满的处理。另外,由于宜山地委被批评后,及时在报纸上检讨认错,进行自我批评,反而使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得以提高,让群众感到党组织知错就改、光明磊落的优良作风仍在发扬,更加信任和拥护党组织。而且从宜山地委后来不服中共广西省委纪检会《处分决定》,要求重新处理来看,如果该报不进行及时的批评,没有引起上级党委的高度注视,祖××的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许多人还将继续蒙冤。

九、余墨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看,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弊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目前已具备取消中宣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有利时机、条件和必要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宣传思想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努力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根据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按照十七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精神,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废止已经执行55年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使我国的舆论监督能够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犯正确”与“紧跟错”

——不准实事求是的悲剧

● 冯东书

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对过去的极左路线实行拨乱反正中，我听到的两个怪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可怕的“犯正确”

有一次，我去看望新华社的一位老领导王康。1954年他从新华社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5月，他在反胡风运动中任审查胡风集团的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办具体事务和参加一些领导小组的会议。当年，他在确定胡风问题时因为实事求是了一下，就倒了大霉。主要一条是，他派搞胡风专案的同志到南京敌伪档案馆查阅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特务系统的机密档案。回来对他说，那里非但没有发现胡风与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什么政治上的勾结和组织上的联系，反而证明胡风是国民党严密监视和千方百计打击的左翼文化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系特务头子张道藩还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其停刊。另外，他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有片面性，摘录时掐头去尾，不合原意。他心里就对胡风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对说胡风集团是个与美蒋集团有密切联系并以反对革命为目标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结论，产生了动摇。这以后，别人问他胡风问题查证情况，他总是回答“材料还不够”、“反革命的根据还不足”，但不敢细说。1956年的下半年，他听说在一次“三长”（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联席会议上，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领导同志也认为：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他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领导小

组组长、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党内对胡风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否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谈谈。”陆同意了，并确定了开会日期，发出了开会通知。但是会没有开成，原因是有人提醒：“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这个人就是周扬。“文革”时中宣部被毛泽东说成是“阎王殿”，他被打成“二阎王”，一直翻不了身。他被打得觉醒过来，成了反极左战士。

既然是反革命案，就要公审判决。但是因为各家看法不一，此事就拖得很长，一直到1957年打击知识分子的“反右派”都开始了，还没有定下来。这一年中央领导小组在毛泽东再次催促下不得不开会讨论如何审判的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会上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会上又有人说判定为反革命集团根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说：“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这位副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成为最早以“莫须有”罪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从那以后被打醒，后来也成为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坚定战士。

所谓“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是指《人民日报》在公开发表第三批胡风集团的材料时，公布了足以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密信”，毛泽东在“密信”前加的编者按语说：“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长期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士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其中，所谓“密信”中的最重要者，是1946年7月15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我方地下情报员阿城后来也打成了“胡风分子”，用国民党语言写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寄给了胡风，胡风转给了



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宋庆龄的秘书),再由她转给了我有关方面。这件事,1955年廖梦醒和当过中共中央某部的一位副部长都有证明,证明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员。

再有就是绿原(中宣部干部,也被

打成“胡风分子”),1944年5月13日写信给胡风,说自己要被调到中美合作所去,他有点畏惧。胡马上告诉他,那些地方去不得。绿原就没有去中美合作所报到,躲到川北岳池县的中学当了中学教员。这样也就不是问题。

王康在党内研究胡风问题的高层会议上发表了一些希望实事求是的看法。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在党内会议上不要说发表正确意见,就是发表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是允许的。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些事,开始倒运。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反右倾”运动,有大字报愤怒责问他:“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你为什么还敢怀疑和反对?”他又书生气十足地在检查中说:“当然毛主席决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都是正确的,但个别问题也会有主观主义。”这次运动给了他一个“实际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结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宜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调到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并内定为“控制使用”干部,即不能提拔,不能当一把手,不能出国。他是“三八”式干部,从此一直到改革开放,就再也发不了苗。应该说中宣部、公安部领导都知道他讲的话是有根据的,所以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到“文化大革命”,陆定一、罗瑞卿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他就更惨了,造反派把他的老材料又翻了出来,愤怒声讨:“三反分子王康,敢于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主观主义,砸烂你的狗头!”他的罪行就成了直接攻击毛主席了,当然被打倒。

毛泽东去世以后,1980年胡风问题平反,组织上给王康重新做了结论,认为他那时的态度是

正确的。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再提拔重用的机会了。

他的案子平反以后,有人对他说,他这样的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太多了。他们所以受打击,受处分,当时的理由是说他们犯了错误,或犯了罪,实际正好相反,他们是因为“犯了正确”。当时,上面是伟大领袖要错,你非要实事求是,不整你,整谁?好多人就是因为“犯正确”,戴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甚至送了命的。

可悲的“紧跟错”

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打倒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被关押的情况下,头上除了已有的“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以外,又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更厉害的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共产党。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全场只有一个人不举手,不同意。她叫陈少敏,1928年的老党员。其他人统统举手同意。到了“文革”以后,刘少奇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事实证明,当时全场皆错,只有一个陈少敏是对的。

那时那么多人的心里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之冤?不知道罪名是捏造的吗?我看除了少数人是盲目“紧跟”外,多数人是或不信,或有问号的,但怕“犯正确”,出于恐惧和无奈而举手的。因为参加会议的不是一般人,多数人是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他们是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了吗?人们称之犯了被迫不得已而犯的“紧跟错”。追起根来,责任不在他们。

“紧跟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三十年在党员、干部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新华社记者。

这么多的人犯“紧跟错”,就是那些在一次一次运动中、工作中,因为要实事求是而“犯了正确”导致支付了自己的、甚至子女亲属的终身代价而造成的。人们怕实事求是了,怕坚持真理了,怕讲真话了。陈少敏在那种场合敢不举手同意,是决心不要命了。她也确实倒了霉。

中央一位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毛泽东征求他对胡风的看法时,他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应该批判,但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刚公布,他认为逮捕胡风不妥,影响不好。他发表了正确意见,后来看到对胡风集团那么严厉的打击,他吓坏了,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下可要完了。这以后,他还敢实事求是吗?敢不处处、事事紧跟吗?

还有我们的一位新华社老领导,他1959年夏天上庐山参加会议,包里装的也是各地分社记者写来的有关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办人民公社在实际中造成严重问题的材料。在会上,毛泽东把对‘大跃进’和办人民公社提出意见的彭德怀副总理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反党的‘军事俱乐部’,一下把大家震蒙了(当时多数中央委员是彭德怀的观点)。后来又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整了二百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讲了真话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他吓得够呛。1962年1月,他又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让人讲话,“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指参加会议的大区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于是各路基层书记,纷纷放肆大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中的问题,刘少奇也讲了他同意下面来的同志讲国家‘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讲了“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等等大实话。^注这个会开得民主,大家很兴奋,我这位领导回来召集各分社领导人开会传达。他在传达中说:“人民公社看不出优越性,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还不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经过1957年‘反右派’,把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冲得个稀巴烂。”他完全没有料到才过了八个月,毛泽东就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针对七千人大会,说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尽讲问题)、“单干风”(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翻案风”(为“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这一次一次的险恶惊吓,他以后除了小心紧跟,还敢再实事求是吗?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对我们这些小青年的教育是要当有觉悟的战士。有觉悟的战士是要自己有科学分析能力的脑子的。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越来越强调都要当驯服工具,这就只要听话,不准自己动脑子了。到了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法就是要‘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也就是要无条件的忠于,无条件的紧跟。

苍白的‘实事求是’的教育

“文革”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党、全国、全军的副统帅。1971年9月13日,他谋杀毛泽东失败,坐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沙漠里。这时候上面传来“最高指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提高识别林彪一类骗子的能力。山西有一位县武装部长在下面说,他不学了。他说他学了也识别不了林彪,不学也成不了林彪。他讲的是一句大实话。那时有一个《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第一条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你马列主义学得再好,识别能力再强,你敢去识别在台上的林彪吗?山东烟台地区有过两位青年识别了一下林彪,结果判了重刑。

我们过去从没有间断过‘实事求是’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对党团员,对干部,对普通老百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道理都讲得很多很透。但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教育,就使实事求是教育的作用在相互矛盾中抵销了。这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口头的,纸上的教育,另一种是实践的教育。口头的、纸上的教育是要人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实事求是;但是另一种实践的教育却是如前面提到的,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

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连刘少奇这样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因此被‘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并被整死。周恩来总理1956年正确的“反冒进”,也被毛泽东整得要辞职。而那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县委书记们,“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没逃脱被打倒、斗争的命运,罪名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世界上能像陈少敏那样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不能不变得乖起来。这就使那些口头的、纸上的教育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不信了。由此造成的信誉危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新华社有一位分社社长叫冯森龄,也是‘三八式’干部。他曾对我说:“谁说我们的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我们不少省、地级领导很重视调查研究,但他们更重视调查中央,摸风头,而不调查下头。”使人不能讲真话也是大伤人心的。全国著名作家、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韦君宜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对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牺牲一切,但是没有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多么痛心啊!1978年6月2日,邓小平也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痛心地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我们建国后极左路线为什么坚持的时间那么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次左的路线执行时间最长的一次,造成了一场一场大灾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不停的实事求是的宣传教育中扼杀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牺牲品太多了,实事求是就没有了。

物极必反

人们不敢实事求是,不敢讲真话,使全国工作长期造成一人错全国都跟着错的局面。这就使人们心中,从革命元老到老百姓心中产生了无数的忧虑和问号。“文革”中《人民日报》一位老革命问信得过的一位朋友:“中国还有希望吗?”日积月累,人们心中的思变思想越积越厚,终于造成物极必反。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清明节,猛然爆发席卷全国的悼念周总理的

活动,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海,其中就有诗说:“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四五”运动成了一场反对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大示威,并有了磨刀霍霍之声。当时毛泽东还活着,把运动压下去了,但大概刺激不小。“四五”运动传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要大变了。到毛泽东1976年9月一去世,全国终于自发地爆发了一场势不可挡的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大革命。“文革”中被两次打倒的邓小平马上支持了这场运动。这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吸引了从革命元老到广大农民的参加。“极左革命”得罪了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成天斗、斗、斗,叫人不得安宁,造成冤案遍地。到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国各个领域马上开展了“拨乱反正”,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实事求是之正。在农村,农民首先打冲锋,起来拆了人民公社的囚笼。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解放,起来把毛泽东从1957年起给他们头上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里。从中央到地方高速度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广大受压干部。有了这批干部,国家马上打破闭关锁国,开始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中国一下子进入了让世界惊奇的全新的大改革、大发展的时代。

毛泽东青年时在长沙师范的恩师徐特立,57岁参加长征,当过中共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全党尊称‘徐老’。他原来对自己有毛泽东这名大有作为的学生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越来越为这位学生焦虑。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当年在长沙的老朋友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看徐老。周谷城当年在长沙师范教英文和伦理学,毛是师范小学部主事,两人很说得来,周还参加过毛领导的农民运动(周一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解放以后,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毛和周以后一直是好朋友,有机会总要找他一起聊聊(一般不敢和毛随便聊,毛有一次对周说:“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周对徐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徐老一拍桌子说:“完全对。成了大功,也可能招致大失败。”周问:“毛主席是不是

可以例外呢?’徐老说:“谁也不能例外。”见《北京日报》1994年1月16日《真挚的友谊》)毛泽东晚年的结果,被他们言中。这个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只要不真的把自己放在说一不二的‘万岁’位置上,真正重视调查研究,办事从实际出发,不要自以为真理只在自己手里,不要在党内搞‘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他过去对广大共产党员的教导,保持‘三大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去做,听得进自己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就行,就至少不会发生那么多次重大灾难性错误。这太使人民失望了。过去打天下时,人民曾是能为他献身的啊!现在,他的错误做法,反而从另一面成全了不少因此受他打击的人成为坚持真

理的硬骨头、英雄汉,如马寅初、章乃器、彭德怀、张志新,等等,等等。这批人受到人们尊敬,社会上出了很多赞扬他们的书。其中,胡风的文艺思想别人不一定都拥护,但是他的硬是不低头的硬劲,得到相当一部分人赞扬。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历史真是无情。

注: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宣布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到第一线代表党中央主持工作,刘少奇讲这些话带有代表党中央表态,对来自基层的批评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不是批评毛泽东(毛说退居二线,但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仍抓在手里)。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刘 冰	34.00	7.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	58.00	7.00
季羡林自传	季羡林	4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经历——我的1957	和凤鸣	29.00	6.00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李向东 王增如	34.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	35.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伶 王一心	29.80	6.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叙述了1949-2005年间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深刻经验教训。书中收集的突发事件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经历——我的1957》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合成一个新东西

——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 辛子陵

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混合经济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混合经济，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从微观上说，中国的混合经济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营企业以及港台企业、外资企业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引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囿于意识形态，我们一直忌谈这一点。

当需要走出空想社会主义误区的时候，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民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2003 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注 1}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起码有几十万。工商局官员可以和张总、李总在大饭店里喝酒，没感到有什么“相悖”，一扭脸到了庄严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认中国有资本家。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这个惶遽、尴尬的镜头是我们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当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

美国政治家舒尔茨（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说：社会主义国家重视分配，资本主义国家注重效率。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要激发效率，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则开始追求分配的公平。有人将这种观点称作“趋同论”。^{注 2}

当今世界确是如此。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

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哈耶克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谓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毛泽东早年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原本就是混合经济。毛泽东建国后，要创新，急急忙忙搞所谓的社会主义，背离了新民主主义，搞出了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坏制度。改革开放就是要把这个坏制度改回来，改到原先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上来，还是要搞混合经济并且逐步完善它，发展它。现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注3}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美国叫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战以后，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这是世界最大的变化。我们长期不敢睁开眼睛看世界，孤陋寡闻，要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贻笑天下而不自知。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20世纪的新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老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是：美、英、德、法、日以及斯堪的那维亚等国，都建立了一套成熟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由政府财政为公民提供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就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新资本主义的“新”就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是在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在巴黎公社那种暴力革命的压力下，老资本主义实现了和平演变。1848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描写的那种悲惨情况已不复存在。这就消除了发达国家发生暴力革命的根源。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8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6276美元。工人有了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有40%的家庭拥有股票。根据美国全国职工持股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到1998年，美国职工持股的企业有14000多家，有3000多万名职工持股，职工持股的资产总值超过4000多亿美元。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出现了新的变化。“像三角洲航空公司、摩托罗拉公

司和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公司正在发展这样的劳资关系：订立工作指标合同、利润分成、共同协商作出决定、改善劳动条件和捍卫雇员的权利。最引人瞩目的发展之一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和其他大约12家大公司被迫在董事会中设雇员席位（注：职工中选出的董事）——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注4}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注5}在老资本主义灭亡和老式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传统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过去了。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混合经济是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两种制度趋同过程是经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私有经济以激发效率，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以实现公平——来实现的。这种趋同发展可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其历史意义要经过长时段的发展才能看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国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十月革命”有进步意义。“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了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超越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旧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融入世界，开辟一个由对抗变为融合，取长补短，和平发展的新纪元。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由于私有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增。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升至2007年的5.1万亿元。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四年增产，去年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全国86%的县，让7.3亿农民受益。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5年累计2.43万亿元。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的学生和780

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受益。2007 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451.9 万农村居民纳入了保障的范围。200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 13786 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 2007 年参保人数突破了两亿人; 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扩大到 11 个省份; 从 2005 年开始连续 3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标准。中央财政 5 年累计补助养老保险专项资金 3295 亿元。“胡温新政”得到人民普遍拥护, 我国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注 6}

我国能有如此大手笔的财力物力办这些公有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惠民仁政, 主要是经济发展了, 政府手里有钱了, 这是民生财政的经济基础。拿“胡温新政”作纵向比较, 在关心人民疾苦、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比我党领导的历届政府都做得好, 比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也好得不能比拟; 但作横向比较, 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比, 才知道天外有天。原来我们想当然地以为: 美国富有, 发达, 但在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幸福方面, 美国政府是没法跟我们比的, 一较真才发现, 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 比起美国政府来, 我们只能自愧弗如。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 2007 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 总共约 6000 亿元, 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 为全年 GDP 的 2.4%, 分到 13 亿人身上, 人均 461 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而在美国, 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 15000 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政府总开支的 61%, 为美国 GDP 的 11.5%, 分到 3 亿美国人身上, 人均 5000 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有人会说, 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 没法跟美国比。但是, 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 GDP 的 18%, 而中国 5.1 万亿元财政收入占 GDP 的 20%。所以, 仅财政税收, 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 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注 7} 一个把 61% 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百姓身上, 一个把财政收入 15% 用在普通百姓身上, 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只能承认: 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更多地拨款, 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

中国讲为民做主。为民做主靠好官的天理良心, 好官当政, 人民的生活就好一些, 所以人民盼

望“×青天”; 好官一下台, 仁政就可能没有了。好官要想多为百姓福利拨款, 体制内的势力就可能不容他。中国百姓有 15% (福利拨款) 就知足了, 过去从没有见过政府拿出这么多钱来用在百姓身上, 连连“感谢党, 感谢政府”。在美国, “民有、民治、民享”不是体现在报纸上, 而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中。61% 是天经地义。老百姓用不着感谢谁, 眼睛不看官员的脸色, 就盯着政府的财政预算。你不给我谋福利, 你削减福利拨款, 我选别人, 叫你下台。这一手就把贪官、坏官、庸官全治住了。中国的一套叫人治, 美国的一套叫法治。我们“纵”看要看到自己的进步, “横”看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中国没有制衡机制对财政预算分配和开支过程的强力有效监督, 把钱用在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以及其它形象工程上去了, 这三项开支一年就 1 万亿。从 1978 年至 2003 年的 25 年间, 中国行政管理费开支增长 87 倍。这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市长利文斯通每天乘地铁上下班。^{注 8} 与之相比的中国超级市长, 前有陈希同, 后有陈良宇, 因贪污腐败双双落马。新资本主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多了。中国不学新资本主义, 不学好资本主义, 可能会变成老资本主义, 变成坏资本主义, 变成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那样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必须加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让人民能够行使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重要权利, 切实地监督、约束政府, 才能制止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和腐败。

一提资本主义, 不论新旧, 剥削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对待剥削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剥削的起点是奴隶制。奴隶制社会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制度, 但它的出现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恩格斯说, 没有古代的奴隶制, 就没有近代的欧洲, 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注 9} 剥削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它是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来到世间的。在原始社会里, 人们没有什么剩余产品, 也不可能有剥削; 生产发展了, 人类社会有了剩余产品, 才出现了私有制, 为剥削提供了可能, 产生了奴隶制、农奴制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地改变着私有制的具体形式, 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剥削的具体形

式和递减着剥削量。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各种因素中,劳力、资本占75%,科学技术占25%;到60年代,比例颠倒过来,科学技术占75%,劳力、资本占25%。^{注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剥削才能趋于消亡。所以,剥削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史现象,它存在的历史理由,就在于它对于历史的进步是一个不能超越的过程。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时期,剥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在“量”和“度”上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中,必须摆脱官办工会维护资方的立场,资方的正当权益由政府来保护,工会就是要切实代表好、维护好工人的利益,组织领导工人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斗争,绝不允许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残酷剥削工人的情况再现于中国。

“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推动历史的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截至2007年,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主渠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平均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达800多万个,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80%,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近70%在非公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超过90%。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数据,2007年民营企业的纳税比重已经达到了整个国家税收的53%;从全国各省区数据看,非公经济的税收占当地税收比重均达5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5%。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11}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可以叫中国的新资本主义,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

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

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在1944年就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注12}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包括更多的资本主义。我们要套用毛泽东的话坦然告诉极左朋友:“现在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要区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不要一提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新资本主义是个富民兴邦的好东西,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脱离苏联模式,创立新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主义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极左朋友就没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创美好的未来。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在现今或预见的未来,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注:1《资本家冠名案二审》2003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2见香港《前哨》杂志2001年1月号第66页

3[法]让-多米尼克·拉费、雅克·勒卡荣著:《混合经济》(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引言》第2页

4[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9页

5[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8页

6温家宝:《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

7参见网上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文章:《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8《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14页

9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原文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而没有希腊

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全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这样的状态为前提的,在这状态中,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又以同样程度为人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权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

10 张秋舫主编:《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

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 页

11 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 2008 年 3 月 8 日发布

12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文化问题》(1944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文集》网络版第 3 卷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责任编辑 吴 思)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

《炎黄春秋》2008 年第 2 期 71 页,刊载了一张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伪造的。

首先,中国近代史的记载中,只有康有为曾蒙光绪召见过一次,而梁启超则从未见过皇帝。如果说史料记载或有缺失,则君臣如此并站,也大违纲常礼仪,即使是晚清,皇权式微,也不会这么不合规矩。再有,拍这张照片的可能是谁?怎么保存下来的?实在无法想象。惟一的来历是照相的拼接技术。

《炎黄春秋》在我所读刊物中,无可比肩者,望在这类细节上,亦能自珍。
上海读者 李光羽

《炎黄春秋》今年第 4 期刊载《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一文,全面地记述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共)头目波尔布特的发迹史、他执政三年多在柬埔寨疯狂残杀 150 万人民的滔天罪行以及他最后的可耻下场。

细心地阅读两次了,每次看毕,心情沉重,想到:一个独裁者专制的政体,人民的生存权是毫无保障的,更

谈不上自由、民主等其它权利了。

这篇文章一处有错:第 71 页右栏第 5 行:毛泽东向波尔布特推荐姚文元写于 1974 年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据我所知,前者是以张春桥名字发表的,而不是姚文元。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祝它越办越好!

云南读者 农天培

我读了《炎黄春秋》2008 年第 4 期所载《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一文,使我大开眼界,了解真相。文章指出了政府官员损公肥私、奢侈浪费国家巨大的公帑的根子所在,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不合法造成的。因此,希望贵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反映,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真正建立“民生财政”。从根本上、法制上解决腐败、贪污、浪费这个国人皆极大痛恨的大问题,才能真正贯彻十七大精神,实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广东读者 唐汉基

“治方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启事

2008 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 100 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曾不惜身陷囹圄达 7 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炎黄春秋》杂志、《纵横》杂志联合发起“治方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活动。本次活动由新浪网独家网络支持。

一、征文内容:

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可以从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来诠释,另一方面可用亿万百姓所身临其中的每一步印记来展现。本次征文以这两方面为主。要求:1、以“亲历、亲为、亲闻”一件事情为题,突出“小事件,大历史”的主题;2、以纪事本末体讲述 30 年来的一个历

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二、时间:2008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三、评奖及颁奖

本次征文的优秀文章,将陆续在《炎黄春秋》和《纵横》发表,并付稿酬。征文结束后,由大赛组委会评选出获奖文章,颁发奖金和奖牌。颁奖仪式于 10 月孙冶方诞辰 100 周年时在“治方书院”举行。

投稿信箱

xqq0825@vip.sina.com(《炎黄春秋》杂志);

yun9008@163.com(《纵横》杂志)

投稿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全国政协《纵横》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811)

(请在信封注明“治方杯征文”字样)

从反清筹款看另一种传统

● 郭玉闪

革命历来是一群非常之人行得非常之事。近代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而成功促成此事的革命者在从事革命生涯时，所遭遇困难非常之大，也因此多有非常之事。重检辛亥前革命史，种种异常之事，俯拾皆是。

筹款，即为革命活动筹集经费，是辛亥革命前政治上反对力量面临的最大困难。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斯文扫地、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内的同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大通师范学堂和筹款

大通师范学堂和秋瑾，是一段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事实上，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的是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最开始也不叫师范学堂，而是大通武备学堂；徐锡麟创办武备学堂的目的，最初却是为筹款做掩护的，其后才慢慢发展成一个为起事做准备的准军事训练基地。

我们都知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做了会长，不过蔡元培这个会长对于会党组织能力不算很好，而且醉心于学问，不耐烦人事，所以光复会在经费上一直很紧张。而徐锡麟野心大，能力强，在草根的威望也很高，于是，蔡元培就派了他的从弟蔡元康到绍兴找徐锡麟，商量经费的事情。这两人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抢银行（钱庄）的方法来。

抢银行需要人和枪，这枪是当时徐锡麟的一个学生许克丞出钱买了，但还需要训练行动人员的开枪技术。这就要有个掩护。于是筹划设立武备学堂的想法就出来了。在武备学堂的名义下，可以用体育训练的名义把各地素有反志的会党招来训练。而且将来抢了银行，钱财也有地方放。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并没有实施，原因是当

时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而且也没有通驾驶技术的人才，准备的难度太高。嗣后，徐锡麟等的念头又从抢银行转到了武装举事上，徐锡麟还会设想过一网打尽的做法，就是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然后一举歼灭；这个念头被陶成章打消了，陶成章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举事没有意义，非得包括南京、安徽等地呼应才行。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做大量准备方可。

在陶的建议下，这个原来为抢银行准备的武备学堂终于变成了为起义准备的大通师范学堂。当时大通的人气相当旺：原来浙江的会党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兴敖佳熊创办的温台处会馆，正好此时温台处会馆遭遇困难、无形解散，于是这些会党积极分子转而聚在大通之下。大通学校以体育专修科为主。一时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齐聚，声势浩大。后来，徐锡麟为了从内部攻破清廷，离开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里，而秋瑾则接手大通并和一众同志继续培养武装力量，最终，爆发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盗金佛和蒙汗药

革命党的筹款行动，除了徐锡麟的抢银行外，还有同盟会湖北分支的盗金佛。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有关达峰、居正等。他们在武汉活动，最后闹得“坐食山崩，资金不敷”，于是在居正的启发下，关达峰和居正一起去蕲州一带一个香火很旺的达城庙踩点，计划将庙里的金菩萨偷走，把金熔化了卖钱。开始踩了两次点都没有机会下手，最后一次终于下手了，还带了几个大力士和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进发；关达峰那一路只有三人，先到了目标地，因为等不来另一队

(当晚下暴雨),就先下手,在庙的后面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菩萨扳倒了,结果由于人手不够和有用的工具在另一队,这三人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菩萨的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亮之后,挟着金菩萨就想开溜,可惜庙附近的农户(也是庙的信众)起的太早,没有机会了,只好把金菩萨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逃窜。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了,不过又被大汉借机逃脱了。至于焦达峰他们这支特殊的筹款队伍最后得以从粮差手里脱身,还则有赖于他们队伍里有人知晓会堂行话,和粮差能有另一层面的特殊沟通。

比盗金佛还要更离奇的,那就是下蒙汗药。当时有个湖南人叫邹永成的,刚从日本回来,去武汉看望革命同志孙武,见焦达峰叹息经费之事,于是提供情报说他的婢子有很多值钱的首饰。这群为了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者,开始把眼睛盯到了这些首饰上。他们设法从新军里弄来了一些麻醉品,放到这位婢子的早饭里,想把她麻倒之后再从容取其首饰贡献于革命。结果,等到孙武、焦达峰一千人马按时行动时却发现这位婢子“立于堂前,言笑自若”。当然行动也就又一次宣告失败。

造反文化的传统

像这样的故事,常常使我们回想起水浒里的故事。即使水浒里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在孟州卖的是人肉包子,即使它是无论哪种文明都无法容忍的残忍,他们依然成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这其实是我们国家一种悠远长久的造反文化:当天下被无道的昏君蹂躏备至的时候,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看来总是具有无比的合理性。

这种造反文化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目的高于手段。只要目的合理,手段可以不论。革命造成的混乱、纷争甚至残酷,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必需代价。对此发出哀叹的是妇人之仁,革命当然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制造的各种牺牲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如此的堂堂正正,以致革命的历史学家会不厌其烦、事无巨细的一一记录,以供后世瞻仰。

造反文化对吾国吾民的浸染,实在深远。无论王朝时代,还是近一百年来,卖人肉包子出身的梁山泊好汉比比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历史和传统被毁掉了;其实,当我们凑近看这些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离传统实在近得很呐。

(责任编辑 李晨)

本刊更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29页图片说明中“1941年”有误,应为“1940年”;第6期52页左栏倒数第12行“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应为“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53页左栏第18行“北京师大附中”应为“北京师大女附中”



2008年第6期目录

书屋讲坛	立法何为? ——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	梁治平
学界新论	东西方的两种伟大心灵景观 ——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再复 刘剑梅
人物春秋	1978—找回父亲,找回自我 草色烟光残照里 ——兼记父亲刘肖愚与鲁迅、胡风的交往	李南央 李希安
流年碎影	三位沈先生——听张充和讲故事 胡适、《新月》与梁启超纪念专号 不敢忘记 本事新词定有无——方令孺与闻一多 顾颉刚离开北京 有关鲁迅兄弟失和的一点看法	苏炜 王耀文 蒋书丽 桑农 潘光哲 芷焉
思史佚篇	说“道”二则 “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 “武士”的回归	王蒙 宋新夫 李承
灯下随笔	人间笔记(二) “知识越多不一定越不反动” 人性与民族性 鲍威尔“赎买”戈巴乔夫赠礼	狄马 王溢嘉 张宝明 摩罗 陈伟
说长论短	独裁下的荒诞 ——“四月三周两天”与“打字机执照” 蝗虫不吃庄稼?	赵刚 睦达明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两次大寨之行

● 田纪云



田纪云(前排左二)在大寨考察,左三为郭凤莲

一九九二年春,山西大旱。作为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于三月中旬去山西考察旱情,在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陪同下顺便去昔日赫赫有名的昔阳县大寨村看了看。这时的大寨,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报刊上吹捧的文章没有了,来参观学习的也没有了,“文革”中建的旅行社门前也被冷落了。王茂林同志对我说,我是粉碎“四人帮”后去大寨的第一位高层领导人。我看了大寨的所谓“七沟八梁一面坡”,看了葬埋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的虎头山,看了大寨群众居住的窑洞,同一些村干部进行交谈,也听了刚从养路道班回到大寨不久的支部书记郭

凤莲的汇报。这时的大寨还是以农业为主,除人均一亩多地外,还有150亩苹果园,但苹果树早就退化了,结的苹果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还有个小煤窑,但挖了煤运不出,因赔钱关闭了。一九九一年人均分配不到600元。省里的领导向我介绍说,大寨党支部的成员多系陈永贵时代的老同志,为了加强大寨党支部的领导,他们把粉碎“四人帮”后去养路道班工作的郭凤莲又调回了大寨。我看了听了大寨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他们还在陈永贵的老路上挣扎。我在那里呆了个把小时就驱车回阳泉,只喝了大寨一杯茶。行前,我悄悄地向郭凤莲说:“老同志劳苦功高,要好好照顾,待遇可以优厚一点,但你们支部的成员要年轻化,要吸收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工作要有新的思路”,同时,我提笔为他们写了以下几句话:“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路子,同心协力奔小康”。

在离开大寨回阳泉的路上,我与王茂林商量要帮助大寨脱贫致富,我说,大寨如果继续走老路,老思想,老办法是富不了的。我动员王茂林把阳泉至大寨的那段路修一修,能让卡车通行。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惦记着大寨的事。大寨在五十年代曾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一个典型,后来被“四人帮”利用,成为推行他们政治阴谋的工具,危害全国。但责任不在大寨,更不在大寨的群众,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决心让他们改弦易辙,摆脱贫困。我先是让大寨送50名劳动力去广东东莞打工,他们送40人,但不到一年大部分都跑回来了,他们受不了那苦,只剩下四五个有点文化的。随后我又动员泰国正大集团赠送大寨七台卡车,一汽赠送大寨两台卡车,共九辆大卡车,让他们成立个运输队,

把小煤窑的煤能运至火车站。随后我又动员江苏淮阴市毛纺织厂帮助大寨建了衬衣厂和毛衣厂。鉴于大寨有石灰石想建个水泥厂,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让老伴陪同郭凤莲去拉赞助(我去大寨时我老伴也去了,因此,结识了郭凤莲,此后郭凤莲有时来北京办事,也到我家看看,与我老伴熟悉了),山东沂蒙地区无息借给大寨400万元周转资金,所有设备、技术人员都由山东省提供。我又动员香港中策集团董事长黄鸿年先生投资在大寨建起了水泥厂。鉴于大寨盛产玉米,我动员四川省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大寨建起了饲料厂。我老伴又趁去广东的机会,还动员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等地给大寨提供100多万元的无偿赞助。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在人大工作期间,在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省人大主任卢功勋等同志陪同下,我再次去大寨考察并参加他们水泥有限公

司投产典礼。这时的大寨,在各方支援下,衬衣厂、毛衣厂和水泥厂都已投产,也有了自己的运输队,大寨至昔阳的路也已修建完成。大寨已不再是‘以粮为纲’的大寨,而是贸工农结合,全面发展,逐步走向二三产业为主的轨道。我即兴为郭凤莲写了如下的话:“凤莲同志:我希望您率领大寨人,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新的道路、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大寨,重振当年雄风。”为大寨村写了“重振雄风”四个大字。到二〇〇一年,郭凤莲在北京见到我时,她告诉我,他们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元,集体福利大大增加,都住上了新房,不到十年,人均收入增加了九倍。这就是大寨逐步富裕起来的缘由。没有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各方的支援,继续走‘以粮为纲’的老路,就没有今天的大寨。当然,大寨的变化,和他们有郭凤莲这样一个好的带头人,以及大寨人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是分不开的。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110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3003米,井底水温62℃,出井水温56℃,日出水量达1200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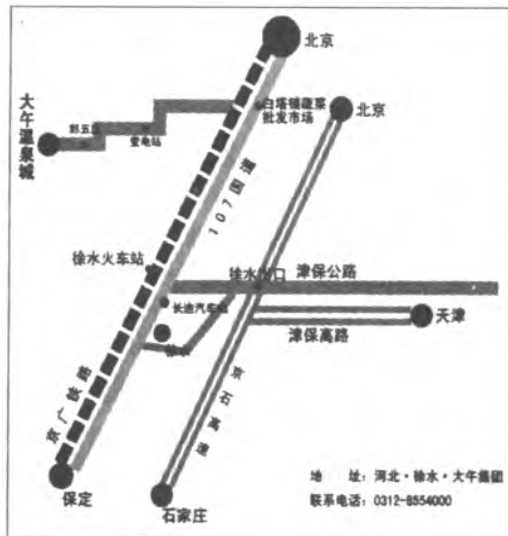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60元,温泉佳宾馆标间280元(含温泉门票48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107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5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5公里、距保定市25公里。保定市12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

——记1958年“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李临雅

回顾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1958年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是仅有的一次针对未成年人的“运动”，而且整个过程俨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浓缩版”，从全国来看，所涉及的人数也不少，而且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件事情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1958年1月下旬，成都市各个中学的行政领导向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宣布：省市有关部门决定，将在全市高中毕业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于是，全市19所中学的近3000名高中毕业班学生匆匆完成了期末考试，背着铺盖卷分别集中到四中、九中、十三中三个点（分别称为第一学部、第二学部、第三学部）。临行前宣布了纪律，学习期间一律住校，封闭学习，不得外出，不得向外泄密，不得携带任何报刊书籍（有的学校宣布可以带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大部分都还不到十八岁的学子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一场已经策划了几个月、精心组织和准备好的“运动”，更不知道，这将是他们一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很多人的命运将会由此而改变，很多人一生的磨难将从这里开始。

195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在中等学校中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大学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中学审查不严混进去的，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有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等等。会上传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关于在全省高中、中专、中师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高中毕业生、中专、中师学生都要搞大鸣大放；放出的问题，要进行辩论，系统批判，但不搞反右斗

争，不斗争本人；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作为考核内容；对其他年级的坏分子，除个别情节十分严重的需开除处理外，其余可留校考察，以观后效。

11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出台，明确了寒假期间对高中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期两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进一步摸清高中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情况，为升学就业安排做好准备，针对毕业生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很快，成都市的这个文件被省委宣传部转发至全省各地、市、州宣传部，强调“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应是评定学生操行的主要内容，操行评定和鸣放中的重要材料，应归入档案，作为本人升学就业考核的根据。”

事情一定下来，成都市委有关部门就给各学校党支部发了文，要求各校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进行排队（这是市委在工人中搞社教的排队标准）。1958年1月，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社教计划，强调“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列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进行审查。……不得向外讲或向下传，在排队的时候，应作好收集资料和建立档案的工作。”决定抽调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或政治教师参加这一工作，大体上一个班配备一个干部。另外，在学生中“每班不超过三人，作为工作上依靠的骨干，集中学习前进行适当的训练，主要是给他们交待任务”。与此同时，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为主要领导，以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珏为组长、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章文伦为副组长的领导班子以及从各单位抽调的人组织的工作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2月初，“社教”正式开始。三个学部的学生集中到十三中，由章文伦作动员报告。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



“模拟反右”亲历者徐祖德

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发生了分化是好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受了坏人的煽动，用暴力反对自己的政府，结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内有的人也很高兴，以为那样很痛快。他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营垒的人心向背和物资力量作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令人鼓舞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然后用毛泽东说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来激励大家相信党，忠于社会主义，相信组织，抛弃一切顾虑，向党交心，自觉地过好社会主义关……

动员报告提出的口号是：“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并且说明“放的范围总的来说是没有限制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闪之念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接受不了的问题，不满意的问题，过去的看法还是可以鸣放，改正了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可能由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即使改变对了，但还不彻底，应该放出来”把看法、想法都摊开“首先鸣放自己的看法、意见，如果知道别人有意见、看法，有顾虑，鼓励他尽可能自己鸣放”……除此而外，章还向全体学生保证，“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保证不影响政治分数，保证不影响考大学，保证不影响团籍。你们不相信，那每班教室门口都写上”……

接下来，就进入以大字报的形式向党交心的阶段了，但不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年幼无知，还是因为“反右”刚过，有的人已得到了家长或亲朋好友“不要乱说话”的点拨，加之对共产党确实没有刻骨仇恨，因此刚开始时，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都是些诸如“在校园某处还可以装一副双杠”“暑期学校应组织高年级同学去农村增长见识”“学校领导工作不深入”“班主任偏听偏信”“评助学金有不合理现象”……等等。另外一些

提出“语言只是一门工具，全国不应一古脑儿地都学俄语”“大学理工科还是四年制好，不一定事事都照搬苏联”之类的大字报，后面签名很少或无人响应。于是，积极分子、工作人员被召见，作汇报。领导们再次鼓动同学们向党敞开胸怀，多写大字报，并在班与班之间、校与校之间开展写大字报比赛……但这些方式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正如运动的《简报4号》中所言：“从大鸣大放和大字报的内容上看，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数量比较少……为了继续解除学生中的各种思想顾虑，把鸣放引向深入，领导小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1、在学生中反复强调要相信党，要下决心要求进步……2、抓积极分子带头鸣放，并对三、四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通过召开三、四类学生座谈会或个别摆谈，具体解除顾虑，对生病的三、四类学生，要关怀照顾，减少抵触情绪。3、鸣放可采取多种形式……4、在鸣放内容上属生活细节的……要尽力劝导不提……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社会方面的意见，应加以鼓励。”

章文伦再次出面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并说：“现在要大胆鸣放，这本身就是鉴别你是否与党一条心……”强调“要纸有纸，要笔有笔，要座谈，给房子，要讲演，给台子。”另外，运动领导小组还专门制定了辩论参考提纲，具体内容为：

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有人说现在大小单位都是党员做头儿，党团员一手遮天，到处马干吃尽，白丁就没眼，这不是党天下吗？这种说法对不对？

2、党的高级干部有特权思想，生活待遇特殊，仗势欺人，这不是新权贵是什么，难道这不是党正在腐化的标志吗？你的看法如何？

3、共产党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压制群众揭露阴暗面，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党和群众的关系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不是事实？

二、关于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

1、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运动，是残酷无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冤枉了许多好人。这种看法对吗？

2、现实社会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歧视，工农出身的子女前途光芒万丈，剥削阶级子女前途暗淡无光。这是不是事实？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策略方针，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手段。这种说法对不对？

三、民主自由问题

1、我们国家的制度是民主的形式独裁的内容,这话对不对?

2、我国选举制度是不是有不民主的地方?等额选举(候选人和提名数相等)是否不民主?事先提出候选人是否不民主?

3、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否是骗局?我们的国家是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

四、农村问题和经济生活

1、有人说“党不关心农民,城乡物质不合理,农民生活苦。”你的看法怎样?

2、有人说:“农村干部作风恶劣,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是不是事实?

3、统购统销是搞好了还是搞坏了?

其实,就是把1957年右派分子的一些典型言论和观点不加评论、不作分析地向同学们宣布(当时绝大多数同学并不知道这些言论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右派言论”),然后要大家大胆地、自由地发表对这些言论的真实看法。

然后,又组织第二、第三学部的学生到“向党交心活动”开展得不错的第一学部(四中)去参观学习、受教育(四中那个点作为重点,提前了五天集中学习,以总结经验)。在那里,学生们看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指挥刀、军装、手枪套等。那是一位觉悟了的同学主动交出来的,他曾隐瞒了其父在解放前夕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和突然失踪的历史。组织者强调,党是最爱护青年的,抗日期间大量有志青年冲破国民党阻挠,奔赴延安,经过千锤百炼,如今都成了革命事业的中坚。他们中间许多人出身都不好,但能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就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出身嘛,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却是自己可以选择的。真诚地向党交心,大胆地鸣放,就是信赖党,就是革命的表现……

所有这些方法终于奏效了。几天以后,各个点上都开始有了一些“有分量”的大字报,诸如:《南共纲领之我见》、《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意义》、《评统购统销政策》等等,很多大字报的内容涉及到了前面公布的那些“右派”的观点,涉及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问题、斯大林主义问题、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红楼梦的现实意义等等。写出这些大字报的同学受到了肯定和表扬,被派到各班介绍经验,于是又激发了更多的人写出更有分量的大字报。而那些被选出来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则按照组

织者的要求,每天废寝忘食地忙着摘录大字报,参加汇报会,听取领导的指示……忙完了这些以后,还要想方设法开辟“新战场”,夜以继日地去找棍子、钉桩子、牵绳子、搅浆子。几个学部的伙食都比平时要好得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更顺利地鸣放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东西来。

运动组织者所期望的鸣放高潮终于来到了,三个学部所在的学校都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运动办公室整理的简报、大字报选抄等材料直接分送省委宣传部和市委。省委宣传部派人直接到各学部看大字报,了解情况。据运动后期“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总结中说:“学生大鸣大放的高潮来得快来得大来得猛……参加鸣放的2917人贴出了大字报32100张,提出了意见63443条,这些大字报和意见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关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其中多数意见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尤其是某些系统的反动言论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疯狂仇恨的叫嚣,真使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而且,“真正鸣放深透的时候,也正是黑云乱翻、歪风上涨、西风暂时压倒东风的时候,这时进步分子孤立抬不起头,中间分子动摇向右靠,落后分子活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肆向党进攻,这时混入团内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了,平时伪装老实不言不语的学生,也行动起来进攻党,这样一来,四类分子的面目彻底暴露,学生的阵营就分明了。”

鸣放已经深透,运动又转入了“辩论”阶段,也就是对鸣放出来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和“消毒”的阶段。先是由学部领导根据市领导小组部署,进行动员,大讲“反动言论为什么必须批判”,说服学生不要“讳疾忌医”既然有病,为什么又怕吃药呢……动员后,着手训练“骨干分子”,研究被批判对象的论点。接着,全市的参训学生连续几天集中在十三中的大礼堂进行了“正反”两派观点的大辩论。各个点上曾经受到表扬和夸奖的“高质量、



“模拟反右”亲历者邓世雄



“模拟反右”亲历者郑胜农

高水平’的鸣放者，代表了“反派”观点，“正派”观点的代表则是经过上级重点培养的、早已做好准备的“阶级立场坚定者”。

辩论首先由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大字报的作者宣读自己的文章，其中有的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和政工干部的“点拨”。接着就是“正派”代表对他们的批驳，批驳者特别提到那些文章的作者的出身，不是反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旧社会的文人家庭，要不就是与当右派的亲戚朋友有密切的往来……认为他们的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路人皆知。针对《评统购统销政策》的作者，“正派”代表义正词严地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胆敢在大会发言时，把自己文章的题目改成了《抨击统购统销政策》，足见其反动本性之顽固，气焰之嚣张。

这个阶段进行了几天后，召开了一个总结大会，成都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讲话，非常严肃地引用了毛主席的教导：“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接来说“几天来的辩论，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青年学生中活生生的反映。有的同学受到批判以后，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说我们搞了阴谋。我坦诚地告诉这些同学，我们从来就没有搞过阴谋，我们搞的是阳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反复说的是要你们向党交心，要你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剖析反动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从来也没有要你们污蔑党，攻击党啊？！你们要利用大民主，利用言论自由来攻击党，这只能说是你们的反动本性的顽固表现，要你们不表现是不行的，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对于你们这样一些人，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要给出路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包括那些还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人，或者说那些有问题但还没有向党交心的人，只要你们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错

误思想亮出来，真诚地向党交心，而不是讳疾忌医，你们也是有数的。我们不是要在你们当中抓右派，你们放心。青年人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锻炼，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确有幼稚、不懂事的一面，这场运动就好比给你们‘种牛痘’，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场运动增强抵抗各种反动思潮、思想的侵蚀的能力……”至于运动前期再三强调的“不带帽子”等等保证，他说：“我们这里有无反动言论呢？有了怎么办？进不进行批判呢？要知道这是党在挽救青年，分析立场才能改变立场嘛！……我们说的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

最后，这位部长再次强调，要求大家把“向党交心”的活动继续下去，以后不论到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都要时时记住经常向自己所在的单位的党组织交心……

不平静的十几天过去了，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他们中学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而在上级部门，对学生的排队、划类也有了结果。实际参加运动的2657（不包括工农速成中学）人中，被划为第三类（落后）的493人（运动前划的是436人），第四类（反社会主义）的92人（运动前划的是6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18.55%和3.46%。这两类共是585人，占总人数的22.01%。有的学生至今也没弄清楚自己在这次“社教”中被划为几类）。有些人的材料中，还有诸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落后分子”等政治帽子。为什么没有公开给这两类学生戴上“右派”帽子呢？当时担任二学部负责人的王堤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在学生中的右派提法上不提右派只提四类，因为中学生不到法定年龄。”

很快，成都市在高中生中进行社教的经验在全川推广，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从二月中旬开始，各地、市、县纷纷出台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富顺县将运动扩大到初二学生。内江市宣布：“师范还要搞肃反……重点人物在品行鉴定中评分，……取消学生资格。”内江运动的结果是三、四类学生实际定性从运动前预排的22.7%上升为25%……另外，由于中等专业学校的隶属关系比较复杂，所以运动开展较晚，但运动的惨烈程度与普通中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粗略计算，全川被划为三、四类学生达到了上万人。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像这样针对中学生的政治运动，当年在全国各地都搞了，而以四川、山东为最。

根据对学生分类的结果，学生们的政治课成绩和操行打分都有了依据。最严重的处罚是政治、操行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其实，有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没有发表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言

论,也早已被‘内定’为三、四类,被剥夺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958 年全省普通中等学校未被高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共有 3200 多人(占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大多为被划为三、四类学生,少数为其他原因没有参加高考的。对这批人怎么办?开始的意见是办一个大农场,把人集中起来,便于监督改造,后来又觉得不好管理,容易出事。而太分散不管也怕出问题。在 1958 年 8 月中旬的一次省委办公会议上,有人提出,各系统都要求把未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分给他们。当时正值 1958 年‘大跃进’缺人之际,而这批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是不是可以?但有人认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被划为三、四类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很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有本人表现很不好的,如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甚至有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的。”总而言之是‘危险人物’。后来由李井泉拍板:“到企业去没关系,反正当劳动力嘛。”会议把对这些人的使用定了两项原则:一是不能当干部,二是把试用期放长,经过改造,对表现好的再个别吸收为干部。3200 人,省上和各地市各分一半,好坏搭配,坏的要当成政治任务接受。

于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对这批高中毕业生进行了统一的工作分配,去向是冶金、森工、林业、建筑等系统……虽然不能上大学,但同学们仍然满腔热情地奔赴工作岗位,想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的同时,还背负着‘政治落后’、“思

想反动’等等沉重的无形的‘帽子’和档案里记载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事先都给基层单位下了文件,强调对这批学生的使用原则:分配不要过于集中,应适当分散,便于管理教育,不规定试用期,一律叫试用人员,或雇用人员。“绝对不能做党、团、人事工作”、“不宜选送学校培养和培训当技术人员”、“不宜作为国家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干部的对象”、“不能提拔或有意个别培养”、“政治上应随时对他们提高警惕”,列为组织上经常‘清理的对象’……这批人在长达 3 年以上的‘试用期’中,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最低的每月 13 元。比 1957 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它坏分子在工作考察期间生活补助费的规定》所规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 2 元。而且,不管他们表现得再好,始终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受到歧视、批判,他们中,有被投进监狱的,有被强奸的,有愤而自尽者、沿街乞讨者,还有的至今仍穷困潦倒,继续着苦难的人生历程……由于没被“戴帽”,这批未成年人享受了“右派”的种种待遇,而又无权享受那些戴了帽的‘右派’所享受的平反改正。他们离开校门以后的遭遇,足以写成一篇大文章,成为‘1958 年高中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续篇。

如今,这批当年的学子都已经是年近七十的人了,他们和新中国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样,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想起当年的情景,不少人仍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泪流不止。

(作者系退休编辑)

按需出版

按需出版是最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它有以下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 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 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自费。

以 20 万字 288 面、规格大 32 开本为例,50 本一般在 4600 元左右(黑白单色)。彩色及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继续征稿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纸张:60 克双面白胶版纸(黑白单色),印刷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 1 号楼 1509 号,邮编:100085,热线:010-59870796,陶女士。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8 年 3 月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悼柏杨先生

● 李 钧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1920-2008)先生病逝。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他在封笔之作《柏杨曰》序中的两句诗,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

这位“反思旗手”、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去了,但他的著述却永远是中国人自省自励的一面镜子。

一、作为文学家的柏杨

柏杨在1984年作《丑陋的中国人》演讲时说:“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后来有人总结柏杨从1950至1990年代的人生历程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鉴、十年人权”。但无论如何作结,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柏杨首先是一个文学家,然后才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

柏杨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却多被其杂文的光芒遮蔽。柏杨小说集有《秘密》、《莎罗冷》、《旷野》、《凶手》、《怒航》、《天涯故事》,长篇小说有《异域》等。这些小说多取材于1950年代台湾底层人民的愁苦生活,状写他耳闻目睹的怪现状,手法多近于纪实。其中《异域》1961年以《血战异域十一年》的题名连载于《自立晚报》,笔名邓克保。小说描述了1949年底从云南溃退到缅甸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极度艰苦、腹背受敌、失去后援的情势下所作的卓绝挣扎;他们最终为了活命而被缅甸军收编,充当炮灰,自相残杀,从而谱写了一曲时代悲剧;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异域的题材、特殊时代的“亚细亚的孤儿”群像,交织成一部悲壮感人的战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至今为止表现这一题材的滥觞之作,也是最优秀的作品。《异域》不仅

在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列第35位,而且早在1990年还被拍成电影并赢得了界内好评。此外,柏杨的另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龙眼粥》也在2004年由导演李行改编拍摄成电影并于次年公映……这一切都表明了柏杨小说具有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与独特的社会价值。

读者都喜欢柏杨的杂文。柏杨自己也最喜欢杂文写作,因为这种文章针砭时弊、痛快淋漓,“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正是由于这种文体自觉,所以他的杂文创作形成了鲜明的特点:“①富趣味性:柏杨杂文善用妙喻,文字灵活,文白夹用,变化无穷,故能吸引众多读者来阅读。②富社会性:勇于揭发社会的黑暗面,对种种不合理现象,敢于也勤于猛烈抨击。③富教育性:有时是举例,有时用反讽的笔法,但主要是反复说明或教导民众一些正确的观念。柏杨的杂文善尽了作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职责。”(应凤凰语)读者很容易从柏杨的杂文中读出鲁迅风。柏杨也自承:“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④读者能从二者的文章中发现某些相近的主题,比如鲁迅提出了“染缸”这一理念:“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鲁迅《两地书·北京四》)柏杨则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将中国不思进取的旧文化指为“酱缸文化”;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狭隘,柏杨则批判中国人的“窝里斗”;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

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鲁迅清理国粹，柏杨则重读“资治通鉴”……在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大陆看重和引导人们读柏杨的杂文，是因为这些杂文对台湾专制政治的黑暗腐败多有批判，而柏杨因言获罪入狱九年似乎更印证了台湾白色恐怖的罪恶。这当然是意识形态的意图。而在今天看来，柏杨杂文所揭出的病苦却并非台湾所独有，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不只画出了浙东流氓无产者的神形。

柏杨的文学成就还包括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坐牢十年留下的“牢狱诗”，更成为1970年代台湾人权文学、牢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鼓呼作用。其中《读史》、《囚房》、《冤气歌》、《邻室有女》、《家书》、《梦回》、《我来绿岛》、《我在绿岛》、《我离绿岛》等都是绝佳的文言诗。在我看来，柏杨的这些乐府体、歌行体的牢狱诗庶几只有流沙河的《故园九咏》堪可比拟，只是流沙河的诗作多了些怨气却少了些坦然。柏杨的牢狱诗除了对狱制酷刑的控诉，更多的是对于命运苦难的承受、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亲情的珍惜。如那首《家书》写道：“伏地修家书，字字报平安。字是平安字，执笔重如山。人逢苦刑际，方知一死难。凝目不思量，且信天地宽。”再比如1976年7月柏杨女儿佳佳探监两日离去后，他挥泪所作的《嘱女》长诗：

千里来探父	父迎乍邂逅
茫茫两不识	迟迟相视久
父惊儿长大	儿惊父白首
相抱放声哭	一哭一内疚
父舌舔儿额	儿泪染父袖
睹儿思往事	利刃刺心藪
旧创初结痂	新创再毒殴
痴痴望儿面	父心泪中抖
环岛踏胜迹	汗湿裳衣透
儿或挽父臂	父或牵儿手
温泉洗双掌	绝壁听海吼
高崖攀灯塔	佛洞卜神佑
缠父打乒乓	父女大交斗
笑声彻屋宇	又如旧日友
儿居招待所	窗外萌椰柳
诸友屡邀宴	率儿起敬酒
明月照小径	父女并肩走

喁喁儿时事	指天询北斗
儿卧酣酣睡	父傍彻夜守
听儿呼吸匀	喜儿不解忧
儿虽已长大	仍是一孩幼
睡时仍踢被	不能自察纠
乘车惧颠簸	嘱儿紧抓绶
饭桌用饮食	嘱儿垂双肘
坐时儿弓背	嘱儿挺胸钮
食罢不刷牙	嘱儿勤加漱
隐镜疑伤目	嘱儿另选购
琐琐复絮絮	惹儿嫌父朽
二日匆匆过	留计苦无有
儿自凌空去	父自归窗牖
再视儿睡处	抚床泪如漏
小径仍似昨	父影独佝偻
重见尚无期	念儿平安否
自爱更自重	莫贻他人口

柏杨1982年出版了《柏杨诗抄》，这部诗集在1991年为他赢得了“国际桂冠诗人奖”，评语说他的诗是“一个天赋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而柏杨则在答谢词中说：“中国的优秀作家和诗人，跟世界上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其他国家的作家和诗人一样，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愿牺牲自己的良知、不愿屈服于权势、不愿为世俗的荣耀或利益，甘心在专制独裁者之下，当一个被阉割过的宦官。这些作家和诗人常常惊世骇俗，写出由性灵转化而成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智慧的火花，强烈而耀眼，在人们脑海中产生震荡，于是不可避免的，冒犯了专制独裁者，或者虽无意冒犯，而只是不屑于奉承，但得到结果却都一样。作家和诗人心目中只有博爱与和平，追求的只是平等，从法律平等到人格平等。然而，这种特质却是专制独裁者最畏惧的炸弹……”^②

柏杨的创作实绩证明着——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二、柏杨在文学史中应居于什么位置

柏杨的文学成就早已引起了海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海外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曾多次召开柏杨学术讨论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

研究中心’曾举办‘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举办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台南大学举办了‘柏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这些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柏杨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柏杨文学评论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的《爱情挣扎——论柏杨小说解析》1994年由台北汉光文化公司出版,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雷锐、刘开明合著的《论柏杨式幽默》1994年由台湾星光出版社出版,雷锐的《柏杨评传》也在1996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柏杨的文学史地位正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而渐成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但是目前大陆编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专门的港台文学史,对于柏杨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却重视得不够。由于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港台文学史的缘故,我常翻看港台文学史,发现其中几部90年代出版的港台文学史,不仅不谈柏杨的小说诗歌,连柏杨的名字也只字不提,这让人好生奇怪。我想,作者绝非不知道柏杨,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后来才想到那几本文学史不写柏杨,一定与以下几件陈年往事有关:

首先,柏杨50年代创作的《蝗虫东南飞》等小说具有‘反苏’言论,从而株连了他的其他小说——并不能进入大陆编的文学史。但是柏杨后来说:“我当时并没有想搞什么影射,但在潜意识中却有不满意蒋家父子的东西。刚到台湾时,官方提倡反共小说,我也写过反共小说。但我跟别人不完全一样。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称共产党为‘匪’。我觉得应该尊重人家。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奸淫烧杀,反而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军容风纪,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历史无可避讳。如今随着档案的揭秘,自沙俄到前苏联当局对中国的觊觎和分裂行径已广为人知,柏杨那时的小说创作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纪实’,有着深沉的爱国情结在里面。

其次,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曾于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大陆引起过轩然大波。台湾林白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在台湾立即引起轰动。当年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曼先生1986年在内地率先‘内部发行’了《丑陋的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一下就销售了几十万



晚年柏杨

册;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也在下半年推出了《丑陋的中国人》。到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柏杨妙语》时,大陆掀起了空前的“柏杨热”。这一年柏杨回故乡河南辉县探亲,故乡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意请雕塑家李学塑成一座柏杨的高大胸像。但是大陆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接受却并非一帆风顺,它一进入大陆即引起了广泛论争,《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作品与争鸣》、《红旗》、《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卷入了争论,这些论争在1989年1月由华侨出版社结集成为《〈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一书。而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文章则将批判推向了高潮,不仅柏杨的书在大陆全面禁售,河南辉县也拆除了3年前为他树起的那座高大胸像……

我想,正是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才使得柏杨没能进入“重写文学史工程”中产生的“新编文学史”,这使得‘柏杨在文学史中应居于什么位置’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也让人对‘重写文学史’工作提出了质疑。今天想来,我倒不会再谈‘这事件再一次证明了学术的奴婢地位’这类不证自明又大而无当的话题,只是产生了一个荒诞的想法:希望当年大陆对柏杨图书的禁售是因为反对“盗版”;要知道直到2004年8月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才是柏杨第一次正式授权的大陆出版他的著作。

三、柏杨：当代中国的一面镜子

喜欢柏杨，是因为他标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下半叶所应有的精神高度，也因为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

他首先是台湾民主进程的一面镜子。柏杨入狱的罪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同笑话，却从反面证明了专制政制的讳疾忌医、色厉内荏与外强中干。柏杨曾两度入狱，第一次入狱是 1950 年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被判刑六月。第二次则是 1968 年 1 月 2 日《中华日报》‘家庭版’刊载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 时的短小译文：译文中提及 Popeye 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小岛后‘乐不思蜀’，两人还各自为竞选‘总统’而撰写文宣。问题就在于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于是国民党情报单位就曲解为暗讽蒋介石父子，罗列罪名将其逮捕，判处 12 年徒刑；后虽获减刑，但是自 1968 年 3 月 7 日被捕至 1977 年 4 月 1 日释放，总共度过了九年零 26 天的牢狱生涯。柏杨说：“我在蒋经国领导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服务过，切身感到蒋经国神经过敏得很。那时有一部西方影片，描写拿破仑被囚于一个海岛，他的情人去探监。男演员好像是马龙·白兰度，女演员是索菲娅·罗兰。蒋经国征询我们对影片的意见，我们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蒋经国说：‘这是在讽刺我们退居海岛呀！’这部影片于是就被禁演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天下’的专制者惶惶不可终日的脆弱心态。柏杨被构陷入罪，险些被枪毙灭口，他自己也曾绝食 21 天企图自杀，但是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而且在监狱里开始转向文化和历史研究，因此柏杨说：“我的新生从被投入监牢那一天起。”至 2004 年 1 月 17 日“政府”正式对每位政治犯颁发恢复名誉证书，1 月 29 日，“监察院”公布一本《郭衣洞叛乱案调查报告》，指出柏杨十二年刑期系未审先判，罗织罪名。这份平反距事件的发生已去 36 年。柏杨的这段经历，实在是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一段最好的人证。其实，1950 年代以后的台湾，雷震、傅正、柏杨、殷海光、陈映真、李敖等人都因言获罪成为政

治犯，在在说明了当时台湾政制的集权专制。但是他们为‘自由中国’而付出的心血也换来了巨大成就：蒋经国 87‘解严’结束一党独统，从而使台湾走向了真正的民主道路。

其次，柏杨是中国人反思中国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镜子。柏杨 1979 年 1 月出版了狱中著作《中国人史纲》，这是一部反思中国文化的力作，1985 年在台湾被评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他 1983 年开始写作《柏杨版资治通鉴》，刚刚出版的一册即在 1985 年被评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这套古文今释的著作到 1993 年出齐 72 册，完成了近千万字浩大文化工程，完成对中国历史的剔梳和反思，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部重要的‘启蒙’之书。他 1985 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集中批判国民劣根性，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精神，与大陆的新启蒙运动一起推动了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丑陋的中国人》2004 年被上海《书城》杂志票选为 20 世纪最后 20 年影响中国最大的 20 本书之一，说明了它恒久的魅力，而中国人今天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部著作，并将其当作自我反思与精神疗救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心态的成熟与自信。

让学界感到高兴的是，学界的历史观念正在发生着悄然转变。2007 年 11 月 29 日《南方周末》载朱强等人的《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日记里的蒋介石》等系列文章，谈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可能对近代史研究带来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早在 1995 年就把中国人互称为‘匪’的情形总结为‘土匪史观’，并指出“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土匪史观”，双方历史学家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匪’，而不像今天国共两党和解后的‘贵我两党’。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必然是错误的，比如大陆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甚至最近几年还有人说‘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假抗战，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指使’。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对蒋的评价，有些人说他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和‘民族败类’等等，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一度被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称为‘民族统帅’和‘伟大领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前言中说，历史

注② 柏杨：《诗人的祈福——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于美国凤凰城国际桂冠诗人联合协会致词》，原载1992年9月台北《文讯杂志》。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 80 页)可能是一个什么信号,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管得过死带来的后果。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所有报刊、图书上发表的文字,都代表党中央的声音,传达的都是党中央的信号。这就把我们的作者、编者搞得非常紧张和拘谨,迫使他们把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与上方对口径和消极防范方面,从而扼杀了作者、编者的创造性思维,窒息了思想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当前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十七大的精神,给公众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作者所写都是自己想说的话,传达的只是个人的信号,言论自由成为社会舆论的常态,那么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就不会引起那样的误解和猜测了。

其实，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复杂的背景，就是围绕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决策机制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认识，举了那么一个例子，讲了那么一段故事。其中讲到赵紫阳，讲的全是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和长期形成的个人看法。文章初稿已经找过几位当事人反复核对，我可以为文中讲的所有细节的真实性负完全的责任。现在赵紫阳已经过世三年多了。他已经成了一位历史人物。对于他一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功过是非，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学术问题，各抒己见，从容讨论。谁的论据充分、可靠、有力，谁的论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时代和世界潮流，谁的论断就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被历史所铭记。对于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一种看法、排斥另一种看法，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成功过。凡是不符合客观事实、违背时代和世界潮流的意识，最终会被历史所清除。我在这篇文章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其中的事实与论点有质疑的，欢迎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赵紫阳毕竟是一位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社会上对于赵紫阳的生平、思想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也会有的。我很高兴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向大家请教。

4月15日稿



《资治文摘》月刊, 16 开全彩印刷
单册定价: 8.00 元, 全年定价: 96.00 元
邮发代号: 80-366
国内刊号: CN11-5609/C

站在主流之上

一个政商精英，
只有放眼天下，胸怀国家，
突破昨日的“级”限，
才能步步高。

一本资政杂志，
只有博采众家之长，
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阅读，
才能傲立潮头。

資治文摘

一本高端资政杂志
为数百万政商精英服务

《资治文摘》的内容注重时代性、
实用性 and 前瞻性、
共设有“专题、资讯、政经、管理、文史休闲”
5大板块、
包含了“政界、商界、人物、明镜、时评、天下、
政略、商略、历史、文化、小说”
等十几个特色栏目、
让你始终屹立潮头、放眼天下宽。

热线电话: 010-65123806 010-65123855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
邮编: 100005

实践标准讨论中新闻理论界的人和事

● 余焕椿

中国又到了—个历史拐点上。上个历史拐点,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史学家和研究者则称之为“大转折”。历经3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三大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半封闭式社会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社会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在世界上,中国的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我国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四;购买力(PPP)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这都是“大转折”带来的大变化。

变化中各种矛盾也随之而来。经济上投资与消费增长失衡,产能过剩,分配不公等等,都是大家公认的。那些本来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把矛盾归罪于改革,认为是改革造成的。这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后果。

最近,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发出“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新的历史拐点上,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大转折”开始时那场实践标准大讨论,想起在那场讨论中为之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新闻理论界前辈,他们当中有的已离我们远去,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的思想、智慧和勇气永远是鼓舞我们的力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追随他们的步伐继续前进。

“两个凡是”与“两个不管”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有两句用来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名言”。“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本来人们对华国锋、汪东兴两位领导同志怀有好感,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同叶剑英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有功。万万没有想到,此时起来反对思想解放,维持那套极“左”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心目中的有功之臣。

“两个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名为两报一刊社论,但两报一刊的总编辑事先并不知晓,连负责宣传口的耿飏都不知道。社论是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思想是华国锋、汪东兴的,最后也是他们审定批准交宣传部发表的。耿飏看过社论说:“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它的出现,理所当然要遭到全国人民最广泛的反对。

首先起来挑战“两个凡是”的是老一辈革命家。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陈云、王震都郑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邓小平则用“准确完整”来批驳“两个凡是”。随后,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对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了详细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

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与众不同,他不指望什么“指示”、“语录”和“文件”,他要找的是客观标准,是“实践”,他相信只有“实践”才能驳倒“两个凡是”。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事实求是改正过来。”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对此进行无理批驳,并坚持要将它从文件中删除。

胡耀邦是得人心的,你可以删除文字,但删除不了思想。“两个不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已是他深思熟虑的一条重要原则。1977年3月他第二次复出,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不管到哪里,他始终把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放在第一位。短短一两年时间里,解放了那么多“文革”中被诬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推倒了历史遗留下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为沉冤莫白20余年数十万“右派分子”改正……他的勇气、胆略和速度简直无人与之相比。胡耀邦曾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可谓“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

两位老报人激烈交锋

读过《实践论》的人都知道:“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靠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73页)实践是个常识,为什么还发生问题呢?只能一个解释,那就是维护既得利益。

曾有人说,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既然人们可以反驳几何公理这样人人承认的数学常识,为什么不可以反驳并不见得人人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呢?所以有人反对不足为奇。

但这关系到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关系能否顺利开展四化建设的大事,不能不辩清楚。《人民日报》早在1978年初就开始组织实践问题的讨论。1月,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3月,发表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文章只有一千字,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何匡、汪子嵩和编辑张德成的精心之作。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大讨论的开始。

真正揭开实践标准大讨论序幕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一文的发表。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中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

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

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胡绩伟同吴冷西的关系非同一般。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时，胡绩伟是副总编辑，是他的主要副手。“文革”开始时，胡绩伟保吴冷西，提出有名的“保旗论”，结果“引火烧身”，为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期，胡绩伟关进“牛棚”，吴冷西推荐胡绩伟到国务院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五卷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吴冷西又向华国锋推荐胡绩伟回人民日报。吴与胡两人关系不说很深，至少可以说是相互信任和了解的吧。可是，到了思想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一个坚持“两个凡是”，一个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不相让。当然，这不是个人意气上的冲突和个人利害的纷争，而是从理性高度，考虑到做人的责任，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谁也不拿原则做交易，只好分道扬镳。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掌权的，在野的都十分重视，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如果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讨论有可能夭折。

新闻理论界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他们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组织文章用正确舆论反对错误舆论，争取主动。党校仍然高举实践旗帜，走在前面。第二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又是吴江、孙长江写的。文章不指名地回答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的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缘故”。

这篇文章得到《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的支持。更关键的支持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他非常赞赏《实》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立刻提了许多很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同意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上发表。新华社也非常支持，立刻在当天全文向国内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转载，各省也陆续刊登。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时吴冷西正在住院。7月底的一天，胡绩

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新时期的“大众哲学”

中央高层的激烈争论，一定会影响地方。因为地方上一些同志也在考虑这个理论问题。1978年下半年开始，各省市党政领导纷纷通过新华社亮相和表态，但发展不平衡。最早起来表态的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他以极大热情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提出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在全国开了个好头。湖南是最后一个表态的，他们的态度是“不急”先看一看再说”。最糟糕的是山西，那里甚至提了个地方性“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进纪录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的经验都要照着去做。”直到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那位来自大寨的副总理陈永贵还不止一次地影射胡耀邦是胡乱帮。

1979年1月，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要面向基层，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宣传。中央新闻单位积极响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舆论，推动这场讨论。

新华社国内部地方编辑组本来是一个负责向地市级报刊广播发布新闻的部门，他们的任务是将新华社的大广播经过缩编，变为小广播，供地市级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这回他们策划了一个重大行动，提出要像当年艾思奇写《大众哲学》那样，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成通俗讲话，让亿万工农兵和广大群众能够读得懂，听得清，了解大讨论的重大意义。新华社国内部地方编辑组决定请专业理论工作者参与通俗讲话的写作。地方组组长赵慎应、编辑蒋涵箴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夏澍、蒋国田、陈中立等同志商议，根据地方广播特点，确定编写24篇讲话，社科院哲学所为此抽调13人组成写作班子。全部稿子由蒋涵箴负责编辑，赵慎应负责

审定,通俗讲话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总题目,每篇不超过1500字,全文近4万字。

三位老总一篇短新闻

1976年天安门事件,是“文革”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之一。这件事直接关系到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关系到能否真正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能否迅速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可以说,平反天安门事件是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突破口。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各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声最高。

人民日报在报道天安门事件时,秉承“四人帮”意志,做过许多不实报道,反映过许多歪曲事实的情况,有责任尽快查清真相,给社会一个交待。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给中央写了一份清查报告,详说“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宣传口耿飚看了报告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可是过了一年多,报告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椿不甘心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1978年2月,他将清查报告拿到政协会上去发言,呼吁政协为平反出力。结果遭汪东兴训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

“两个凡是”阴霾仍笼罩一切,平反一事又搁浅了。随着实践标准讨论步步深入,阴霾也渐渐散去,人们重新看到希望。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北京日报》对常委扩大会作了详尽报道。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首都新闻界几位老总,胡绩伟、曾涛、杨西光,看到报纸很兴奋,同时又觉得决议关于天安门那段话湮没在长篇文章中,不能引起普遍关注,十分可惜。凭他们的新闻敏感、工作经验和社会责任,决心写一条专讲

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此时新华总社国内编辑部的同志们,同样敏感地觉察到这件大事,已从《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市委会议公报中摘编出这条新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新华社编的这条短新闻后,送给了新华社社长曾涛,提议做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干脆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杨都赞同,并且确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

但是,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是不是文不符题?也无把握。于是,他们请于光远来一起商量。据于光远回忆当时情况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于光远:《大转折》74页)。就这样,事情定下来了。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通稿,16日首都各报以及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大大振奋人心,震动世界。读者反映,新闻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这天头版上方通栏刊登的新闻版面是这样的:

引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主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副题: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两个司令部两支队伍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两个司令部。“文革”中说两个司令部,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虚拟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用来排除异己的,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下转67页)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

● 彭小莲

胡风分子、诗人冀汭的女儿殷殷给我打电话，她说：“贾植芳伯伯去世了。”什么时候？”就刚才。”我一下被吓住了，就在几天前，我刚去医院看望了他，进门只听见贾叔叔大声地说：“小莲，你怎么没有给我带水果来啊？”顿时引得边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在任何时候，贾叔叔都是要让大家快乐的人，他像一个做脱口秀的演员，随便你怎么笑，他就是虎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笑声依稀还在，可是人怎么已经走了？

记得，第一次去看贾叔叔的时候，他在赠送我的书上，题签的是：贤侄小莲留念。那是80年代初。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怎么成了他的侄女。后来，殷殷跟我说，你到全国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

胡风分子的地方，说你是‘分子’的子女，你到任何人家，都会被接受，都会让你吃好住好。他们这些人，即使在上个世纪，互相之间不称呼‘同志’；他们称呼为兄弟，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贾叔叔的侄女。后来，我去了全国各地的‘分子’家，果真被招待得像侄女一般，我被这一份温暖和亲情折磨了很久很久。

我爸爸彭柏山比贾叔叔年纪大六岁，我称他为‘叔叔’。贾叔叔跟我说：“我没有跟你父亲说过话，我只听过他作报告。他是当官的，我们这样的小民，就坐在下面老老实实地听吗。不过，你父亲还不错，还是一个读书人。”

我看他给我父亲做的补充语，哈哈大笑，这算是他给我父亲很高的评价了。贾叔叔一下也领会

(上接66页)司令吗？当然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真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两个凡是’司令部，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一个是实践标准司令部，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前者是实权派，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后者是实力派，拥有优势的理论队伍。实力派的理论队伍较强大，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而‘两个凡是’队伍显得单薄，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吴冷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阵地《红旗》。除‘两个凡是’那篇社论外，就未见过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的文章。倒是谭震林一文掀起一阵波浪，让人记忆犹新。

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文章，谭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熊复主张删去这部分，派人向作者说中央明确《红旗》不介入实践标准讨论。谭震林大为恼怒，说‘文章中材料

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熊复无奈，只好将谭文送中央审定。邓小平看了文章作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熊复又请示汪东兴，汪告知“只好如此”，文章才得以在《红旗》上发表。

这两方面的争论，没有排斥异己问题，只有排斥错误。没有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只有打破思想禁锢。更有意义的是，这次讨论结果是真理战胜权力，开创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思想斗争的新局面。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

(责任编辑 杜晋)

了我的笑声,朝我眨了眨眼睛,又对我说,“我在日本当流亡学生的时候,在书店看见你父亲的小说翻成的日文,鲁迅先生给他写的序。”

除了胡风先生,我父亲和‘分子’们都不认识,其实他们互相之间,大部分的人也都不认识。这是一群很奇怪的朋友。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群因为戴着‘胡风分子’帽子的人,都很想看看,被打成一个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都是些什么人。

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年轻的一代几乎不能相信,所有的罪行和证据,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交出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构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再加上断章取义地上纲上线的分析,及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评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了。胡风先生信中涉及到的诗人和作家,后来都成了‘分子’。当时,谁都不知道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但是按语中的‘雷霆万钧之势,绝不可等闲视之’的气氛,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1955年6月至7月一月之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作为单行本的小册子,仅仅在上海就印刷达八次之多,数量为60万册。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数据是:1955年5月之中,92人被正式逮捕,以后63人被隔离监禁,73人停职审查;2100多人被影响受株连。

直到1965年,这个案子才被送上法庭。这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都已经被关押了十年之久。但是最后只有三个人正式判刑:胡风先生14年,诗人阿垅12年,贾植芳叔叔12年。其他‘分子’被免于起诉。我们认真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荒诞出现了。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等等的对话条件下论争现实的。陷害是一上来就被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有意思的是,这样违反法律的事情,却又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正式开庭,依然出示证人,而证人的供词是被事先审查过,并且指定证人必须背诵证词。阿垅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时候,如临大敌,警察全部出动,因为阿垅先生坚持自己无罪,坚持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人为的,是捏造的。胡风先生双手拢在自己的袖子里,站在北京法庭的被告席中,他还想保持一份人的尊严,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戴着手铐!面对荒诞,贾叔叔竟然用黑色幽默,用自己的生命

面对它,开了一个玩笑。

他最后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向我描述被拉出去判刑的那一天:“1965年的一天,他们在叫1783号……原来上午那个老法警来了,他跟我说:就是你,你还不结案啊?你不懂规矩,你上去。我后来到了车子上,他们问我,你吃过饭了吗?我说我没吃,他说那我给你拿一碗饭。青菜一碗,还有一个豆腐干,一个米饭,我把他都吃了,他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有,没有再拿一份。他说要吃饱。只有死刑犯才让你吃饱,我想死都要死了,那就吃他个饱,不要做个饿死鬼。后来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不到两点钟,来了两个青年干警。他们说,走,走。他们把我送到一个武警大厅,一到里面,已经坐满人了。里面一个审判长说,把这个老反革命贾植芳带上来……电视里照相的都来了。”

“胡风应该是1965年11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14年,他们跟我说:‘罪犯服法……’我听成‘伏法’,把胡风听成枪毙了。因为过去说伏法……就是杀头的意思。所以,我以为是枪毙,我想怪不得不得枪毙我,把胡风给枪毙了。我想胡风都枪毙了,我不要听了。我想多少年了,搞了这么一个结果。于是随便他们讲,然后他们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不上诉!判决书要我签名,我看都不看,就签了。他妈的这个混蛋,我们过去为了追求共产党,监狱进进出出,饿肚子。后来宣判完了,就把手铐给我戴上。我感到蛮光荣。”

“为什么感到光荣?”

“我不是舒芜,我没有背叛朋友。蛮光荣。”

2003年春节,我去给贾叔叔拜年,正赶上‘分子’何满子叔叔夫妇、小顾(征南)叔叔都在那里。我一进门,贾叔叔就说:“怎么不拍拍你爸爸的事情,这不比什么故事都好看吗?”没有你这样的人物在里面,还会有什么好看的?”那就把我和这些‘分子’都拍出来啊。”于是,边上的‘分子’都笑了。

可是我却笑不出来了。我知道,贾叔叔的幽默里面总是含着太多的思考。后来,我和朋友魏时煜一起把摄像机对准了他们。

“我嫂子去世了,她是李大钊的女儿。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到北京开比较文学会议,去见我哥哥,他说要去买骨灰盒,我说就买一个最贵的。工作人员来汇报,说是,最贵的是120块钱,那是部级干部才能买,李新华

同志是个处级干部,只能买 80 块钱的。我哥哥心里很难过,说‘就买 80 块钱的吧。我跟我哥哥讲,我死了,3 块钱都不要。我哥哥马上脸就板起来了,‘你改造了 20 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讲话这么随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这个中国,活着有等级,死了都有等级。我跟我哥哥讲,我的身份三块钱都花不了。我就不要到北京了。’

贾叔叔又吸了口烟,稍微变得严肃一点:“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杀掉,我们这里叫群众专政,叫你自己寂寞自己,寂寞得叫你受不了,就自杀吧,就说你是畏罪自杀。所以我就不自杀,自杀洗不干净,还留个名,他说你畏罪自杀。不然他挽救你,你拒绝就是畏罪自杀。所以不能死。我天天脖子上套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小孩子围上来问我,人家牌子上都只写一个名字,你上面怎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我说,他是我朋友就一起写上去了。大家都一出校门,就把牌子摘下来,他们带着包包去学校,摘下牌子就放在包里。我从来不带包,提在手里也重,我就挂着牌子往宿舍走。工宣队说,‘你还挂出瘾来了!’你们给我挂的呀。’‘拿掉了!’其实,是后来上面说不要挂了,影响不好。我也不知道影响谁了。”

于是,他又继续说他的笑话:“刑满释放,我回复旦监督劳改。每天回家我绕校园一大圈走出去。我绕过毛主席老人家的雕像。现在这个雕像还在,你可以拍拍。他很高大……”

突然,贾叔叔嚅地一下站起来了。“我绕着走啊,因为我发现他一只手背在身后,手上拿着一顶帽子,那一定会在你走他跟前,乘你一不留神,呼地一下,把帽子盖到你头上了,我戴了一顶够了,不能再戴一顶了。”说完,他背在身后的手,敏捷地在你眼前一晃。天呐,我怎么就没有看见过比他更生动的演员了?

20 多年过去了,从我踏进贾叔叔的小屋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搬迁过。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水泥的宿舍单元楼,几乎所有的‘分子’都是这么生活着。不论他们的著作在书架上排了多少,不论他们得到多少这个那个国内和世界的文学奖,不论他们在国外留学以后,建树了多深的学问,他们的生活依然是简单、朴素和淡泊的,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和摆设,贴墙是一大排书橱,里面塞满书

籍。贾叔叔把我的书也放在显眼的位置上,那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写了那个时代,写了他们的故事,写了一本他认可的书。

有一个教授离开上海调往北京的时候,他说,即使在上海的大学里,大家见面不是谈股票和买房子,就是谈自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学术气氛,不像北京。真的很遗憾,上海就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我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的朋友,这些‘分子’给了我一份很珍贵的馈赠,那就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们都生活得很清苦,他们除了做学问、谈政治,还是在那里做学问、谈政治。

我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愿意说我在谈政治。可是,你去思考这些‘分子’的命运的时候,政治就在那里,他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你一次又一次想脱掉他,可是就脱不下来,就是脱下来了,会变得赤身裸体。于是你不得不站在一个炎热烈的光照下面,面对着他,把他改变成原来的面目,重新感受到,衣服真实的质地和用途。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是被一份灼热煎熬的过程,我一次又一次跟自己说,不要害怕,不要哭泣。要坚强点!我必须做一次零距离的记录,我要保持思考,我要坚守住我的理性。可是,我一边跟自己说,一边咬着嘴唇,眼泪还是往下淌,因为我看见了他们生命的消失,消失得那么无谓,那么残酷;最残酷的是,他们是那么清醒/明白,却无能为力。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我在残酷面前更是束手无策。

2003 年夏天,我和魏时煜带着贾叔叔和何满子叔叔去回访提篮桥监狱。天,很热,那时候我还不意识到重新面对关押过他们的监狱,他们是什么感受。我想的是他们命运的戏剧冲突。那天气温 38 度,两位 80 多岁的老人,居然一直走在炎热的大太阳下,他们显得那么冷静,四下看着。

监狱的政委对我们说:“监狱里面不能拍摄,不能参观。”

贾叔叔问:“能看看我当年关押的地方吗?”

政委说:“不行!但是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展览厅。”

贾叔叔微笑着问道:“那里有我的照片吗?”

政委说:“没有!”

“那就不看了吧!”

政委有点尴尬,这是在监狱啊。我这才体验到贾叔叔的幽默,体验到他个性中的力量。但是我紧

张得不敢对他的幽默发出笑声。

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我托人给他送了西瓜去,听说他感动地都要流泪了。”我赶紧去找何满子叔叔,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叔叔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很好!”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何叔叔更加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还是去了。一看,贾叔叔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拿着一本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他看见我走进来,只是扔下书,连姿势都没有改变,问我:“小莲,要喝水吗?不要,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贾叔叔,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

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着急了,再追问他:“是吗?”

回答很简单:“是的。”

“凭什么?”

“因为我坐了25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因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监狱。学校要给他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

我大声地质问贾叔叔:“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这时候,我看见贾叔叔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他连看都不看我,这时候我这个侄女有点不像他认可的自家人了,第一次看见他真有点不太高兴了。他管自吸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

贾叔叔回答我的话,何叔叔也曾经说过:“我们不要做官。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我没有说话,也许对别人我会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你管这个,先拿钱再说。但是在贾叔叔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在贾叔叔去世几天以后,我看见有人写他的回忆文章说,贾先生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是靠给人家写序,得来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的。天呐,竟然有人会这样去理解贾叔叔。

这位写序专业户,一定又是跟谁开了个玩笑,于是人家就把这当真了。听贾叔叔说话,即使听他的笑话,也要用点脑子。他带着他太多的真诚和幽默,可他不是红尘里的人。你要用世俗的价值来评判他的话,他真的就会被解释为‘眼泪都快出来的人了。’只有何叔叔,他们这一代人,才会从根本上理解和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眼泪,在1955年被捕坐牢以后,只流过一次,那就是他夫人任敏阿姨去世的时候。满满的大厅里,拥挤了几代贾叔叔的学生,大家在为师母送行!贾叔叔在学生的搀扶下走进来了,走到夫人的遗体面前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八十多岁、一辈子都是浑不吝的老人,突然不顾学生的坚持,“咄”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来,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他说:“你跟我苦了一辈子啊……”

我把对贾叔叔的采访提问修改了,原来里面有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成为胡风分子后悔吗?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后悔,即使在文革中间,那么多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胡风这个名字,但是贾叔叔还会对那些讥笑他的孩子说,胡风是我的朋友。这份黑色幽默里面,沉淀下多深的思考,也体现了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

其实贾叔叔对胡风先生是有认识了,他知道胡风先生书生气太甚,政治上幼稚,容易被伤害。

“冯雪峰在开国前在上海的,后来北京打给电话叫他到北京去。后来他回来跟我们讲,‘毛泽东同志把我叫去,问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后来冯雪峰说,‘毛问他,听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冯雪峰听这个话觉得很奇怪的,就来对我们讲。我一听这话就警惕了,我想怎么把一个文学现象看成政治现象,把文学社团看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后来小莲啊,你不知道,后来就变成一个社团流派……我编一本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所以他把文学上的一个社团流派看出一个政治问题。他看问题和

我们不一样，他都是从政治权术方面看问题，不是从文化方面看问题，是把一个文学现象看出一个政治现象。那时候，一直不给胡风安排工作，胡风很苦闷。我就劝他，你不要和他们争什么了。我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十日谈》，我劝胡风就翻译一点书，好好写一本鲁迅传，不要去管他们。”

贾叔叔的幽默原来是建立在他政治上的成熟，他的敏锐和深刻，我只能用大智若愚来描述他。你完全不会想到，他那么轻松的笑声里面，积蓄了准确地观察和思考。

可是，说了那么多的贾叔叔以后，我觉得还是没有描述出他这个人来。

“因为我的关系，我们的学生受株连有二十几个。从前，清朝的文字狱是株连九族，现在株连十族。凡是我们认识的人，都受到株连。连我夫人任敏的哥哥，是个买卖人，是做生意的，也因为和我们认识，把他抓起来，关一年审查。是株连无边。把任敏送宁夏去劳改，后来我平反了，她才平反。”

贾叔叔的故事，从东讲，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从西讲，他又可以是一个“22条军规”的作者；但是就是他，我们还要从北，从南都来讲。只是，讲不清楚。只有让他自己讲了。

“跟我一起劳改的有一个右派，叫潘石慈，从前圣约翰大学的一个校长，他老婆是美国长大不懂得中文，只懂英文，家里很有钱。他和我一块劳改。下午啊，革命群众有紧急通知，我们两个是不准开会的，我们两个在地下室写思想汇报。我跟潘先生讲，你写我打扫卫生，我把那个围裙穿上，拿个畚箕，拿个扫把，我把楼上楼下都打扫了。预备去倒垃圾，路过历史系，唉，外面喇叭响了，奏哀乐，我说哀乐一奏就是大人物了，我就站在那里，一个手拿着畚箕，一手拿扫把站在那里，这时候就听到一个中年男子非常沉痛的声音在说，中国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导师离开我们了。我一听，噢毛泽东死了，我把垃圾也倒了。我回去的时候，楼上传达完了，有的人就在那里哭。潘先生还在那里写：我是一个洋奴，是一个买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说潘先生不要写了，红太阳落下去了。

“我跟你讲啊，我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25年啊，先坐牢11年，劳改13年。我中年就是在牢监里，我抓进去的时候38岁，我平反的时候60几

岁。中年就没有了，不是监狱就是劳改。毛主席万岁！”

说着，贾叔叔高呼着口号，学着文革时候的样子，猛地站立起来。我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再也顾不得我的同期录音了。

我终于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

“你跟胡风做了这样一个朋友，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如果没有这个朋友，你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主席，1955年把我们抓进去了，1966年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抗战回来参加抗战，国共合作。可是地下党突险，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生命就像贾叔叔对我讲述的那样，有一天，他不会再感受到幻灭。在他92岁高龄，在他思维依然那么敏捷的时候，2008年4月24日他的游戏结束了，结束得那么残酷，却是那么漂亮。我记住了贾叔叔跟我说的话：“不要哭泣，站在我的相片面前，不要哭泣，这个地方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不会哭泣。我知道贾叔叔是带着他的幽默去见任敏阿姨了。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完成你的故事。

（责任编辑 萧 徐）

一月剧变： 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

● 金 雁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新纪元’问题

1917年革命对于俄国与世界的巨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这一过程中的关注点，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1990年代初“剧变”发生时，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俄国人的关注点在于“十月”，而且对“十月”的看法明显地两极化：旧体制的维护者仍然认为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新纪元”；而变革的推动者则认为它是布尔什维克搞的一场非法“政变”，给俄国和世界带来了长远的灾难。实际上，后者同样认为“十月”是个“新纪元”，只是负面意义上的新纪元而已。当时的资料披露水平与人们的心态还不足以使对这一事态的研究具有长时段大纵深的水平，无论作为开创社会主义美丽新世界的“革命”还是作为毁灭民主乃至毁灭俄罗斯文明的“政变”，“十月”是否真就那么重要？1917年前后俄国历史的转折点真是在于那“阿芙乐尔”的一声炮响吗？

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人们心态的冷静化，人们逐渐倾向于在纵深层次上看待俄国历史的宏观变革，同时在更为精细的层次上考察那一年俄国的具体政治进程。

“革命宪政”与二月民主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这套制度源自西欧，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从词汇上使用“立宪会议”而不是用“杜马”反映出“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区别。在近代俄国，这种主张不但被保守的沙皇专制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曾被宣传

“人民专制”理论的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激进派攻击为“富人的骗局”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决裂的一批左派人士，形成了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当年布尔什维克也曾积极要求国家民主，而且非仅“阶级民主”，今天所说的宪政民主也是他们当年强烈要求的。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

因此，是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制”，成为那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普列汉诺夫曾明确地说：“‘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制”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垃圾。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构成其名著《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基本观点。而更早些时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也表述了类似主张，这两部作品加上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普氏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老三篇”，被列宁说成是“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其影响十分深远。从这些观点可见，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一开始就与反宪政的民粹主义者相对立，而且曾经比自由主义者更紧迫。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

人与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激进立宪”(革命立宪)还是“渐进立宪”。尽管在斯托雷平时代开始有所变化:社会民主党内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民粹主义化”乃至“超民粹主义化”,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宪政”的传统感召力和对民粹派“人民专制论”的传统厌恶还不可能完全消失。正是在斯托雷平时代,列宁一方面说了不少(过去很少说)议会民主“虚伪”的话,另一方面仍然在反驳那种认为“虚伪民主”不如专制好的极左极右论调。他认为:尽管多党竞争下的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这一点决不能说明议会民主“根本无益甚至有害,像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民相信的那样”,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多党制,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越多,它的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就越便于……学习政治,即越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通常所说的1917年“二月革命”正是“革命宪政”的实践。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随着貌似强大的沙皇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它由于担心被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这时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以“立宪”为党名的这个1905年时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而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

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而被其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是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使局势失控。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的整个期间,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不但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就是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而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际问题的机关。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

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就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如出一辙。此议案战胜立宪民主党的反对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仅在两周前这正是布尔什维克追求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在此前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其实,在传统上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即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而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还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而且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其实还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都是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差别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

中国人在后来的长期宣传中妇孺皆知的所谓阿芙乐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谓武装起义,其实不过如此。事实上,20多年后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冲锋陷阵场面是斯大林一再指令加码后改拍而成,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问世的爱森斯坦的著名影片《十月》尽管已经受斯大林权力的影响,还没有这样的场面。而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竟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很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

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

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它的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

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已被严厉镇压的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发出什么声音。但在左派(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的不满后来才浮现的)中却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这一天,两个首都发生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可能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利达宫(按:立宪会议所在地)”的,而杀手们不仅未经警告就从埋伏的暗处开枪,而且还“从工人们手中夺过革命的红旗,用脚踏踏它们,把它们投入篝火中”。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罢工被镇压后,全俄铁总和其他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俄国工会从此逐渐“官方化”。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

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实际上,甚至“土地与和平”这两个据说是由十月革命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初的争议主要也不是要不要议和、要不要分配土地,而是要不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这两者,或者即便苏维埃造成了既成事实也要不要立宪会议来承认其合法。主导最后两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是赞成议和与分地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作为临时政府部长颁布的土地法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他甚至起来驳斥“资本家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但切尔诺夫们认为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做这两件事。而像全俄铁总等一些民主组织虽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可以做这些事,但还是应当由立宪会议来认可。“一月剧变”使这些人与苏维埃政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总之,与十月冬宫事件相比,布尔什维克废除“革命宪政”的一月事件无论就当场造成的流血,就事件给俄国人带来的“震撼”,还是就事变内容的社会深刻性和历史影响来看,都要大得多。没有十月事件,俄国肯定也会出现社会主义者政府。当然民主竞选制下谁也不能保证她永不下台,但十月事件中产生的那个“永不下台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今又安在哉?而如果没有一月事件,宪政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就如其他民主国家的社会党政府与保守党政府一样,不会让“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惨遭破灭,让俄国陷入惨烈血腥的内战,更未必会在俄国历史上造成70多年的极权时代。

事实上,1917-1918年间俄国并不是发生了两次,而是只有一次革命,它的开始与终结则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事件:它于1917年2月发生时不仅是“民主革命”,而且当时就终结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在逻辑上开始了导致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向左一面倒”进程。换言之,它是民主革命,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按如今人们习惯的政治光谱,毋宁说它更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而1918年1月社会主义者(尽管并非布尔什维克)占压倒优势的立宪会议被武力驱散,意味着这一革命的终结,它结束了民主,开始了“专政”(但未必

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两者之间的十月事件,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开始也不是民主的结束,只是“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常见的一次政变而已。

后来人们用来称呼“十月革命”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之说,考诸历史,这话最早出自托洛茨基。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后来人们却不提了。但他是在二月革命后从国外侨居地回国时说这番话的,那时还未发生十月事件,他指的就是二月革命,但是“铁与血的新纪元”真正到来,却是“一月剧变”后的事了。

一月剧变与内战: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显得非常理直气壮: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事实证明:从二月革命到一月政变期间,俄国政局在民主预期下的日益左倾并未受到右翼反民主势力的多大抗拒,像科尔尼洛夫兵变那样的个案转瞬间也就平息了。不仅“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水到渠成,

就是布尔什维克抢先夺权后,在许诺尊重立宪会议的70天内全俄局势仍然基本稳定。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摧毁宪政后,右翼反民主势力起而效尤: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历史是由长时段因果关系决定的还是“偶因”造成的?应该说两种因素皆有。笔者曾指出:1905年俄国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互相促进的强大势头。如果不是那场风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双输”之局,俄国完全可能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造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专制下为权势者对传统农村公社进行“警察式私有化”积下民怨,加上后来又唐突发动世界大战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难免。而且这种“革命”天然具有反对“腐败的经济自由”和重建“公社世界”的性质,自由主义成为输家几乎是注定的:临时政府难免要社会主义化,立宪会议即便不被驱散,也没有几个自由派当选。

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中谁能得势、以及得势后具体会导致什么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主要在政治侨民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并无优势,长期流亡后在1917年4、5月间才回国的列宁、托洛茨基也不被看好。国内反斯托雷平运动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在工会中影响巨大的孟什维克都曾经很有希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权谋较量使列宁最终胜出。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宪政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90年后俄国人如何反思1917:“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

是发生在1918年1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包括索尔仁尼琴与普京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测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凡尔赛框架

下建立的宪政民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坚持下来，而难免被颠覆、为专制极权所取代的命运。但由民选领袖废除宪政的，也就仅德国一例。其余包括俄国在内，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战争或强制性“革命”等非民主方式推翻宪政的。因此过分夸张民主对于宪政的威胁、甚至把民主看得比帝制离宪政更远，是没有道理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的确可以说是继承了“二月民主”的事业。但是时代毕竟大大进步了：今天“剧变”后的所谓“阵痛”如果与那一波民主潮相比，无论与俄国“二月民主”的短命及民主被废除后的惨烈内战、与德国整个魏玛共和时期的动荡，还是与欧洲多数国家当时的“魏玛化”危机相比，都可以说微不足道。不仅如今东欧各国都已渡过阵痛，确立了稳定的宪政民主，就是宪政之路最为坎坷的俄罗斯，也没有重蹈“二月民主”的覆辙，尽管其民主体制并不完善而且近年来还有所“倒退”，但也已持续了十多年，根本性的逆转不大可能。今天普京再“保守”，哪怕是斯大林时代的“大国”还有某种“怀旧”，但只要他们不想学列宁，不愿重演“一月”的悲剧，那就如民主化以后的法国人对拿破仑、德国人对俾斯麦的“怀旧”一样，是无伤大雅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8040039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2008050153号

SW 声望听力 网址：<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就“机制”一文答客问

● 李树桥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了拙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提出一些问题。该文在网上转载后，网友的跟帖评论中也有一些提问者。现将朋友们的提问和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综合答复如下：

问：您为什么要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

答：首先是受到去年党的十七大和今年“两会”的鼓舞。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我体会，这些都表示我国的文化政策已经有了新的调整，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待思想文化问题抱有宽松、宽容、宽厚的时代精神。我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亲身试探一下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个多么宽广的表达空间。于是就大胆地把自己思考多年的问题写成文字，发给《炎黄春秋》编辑部。

其次，是为了参与总结、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良性互动机制。那时候对于学界、部门、地方、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意见都很重视，充分吸收，对于正确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然现在大家都来纪念，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同志的纪念文章，一种强烈的参与欲和自我加压的历史责任感激励着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我还觉得，回忆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讲到那段艰难破冰的八十年代，谈到当时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一个都不能少。当时改革开放当中的不少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是由赵紫阳组织研究和谋划，然后提交中央集体决策的；不少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是经过他的精心运作获得党内高层一致认同并写入中央文件的。回忆和总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如果只说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少提胡耀邦，不提赵紫阳，那就不是客观的历史。那样的总结必

然误导后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书写那段历史，就不会禁止人们也写写赵紫阳。

其三，是出于对《炎黄春秋》这份杂志的信赖。《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刊物。其鲜明特色是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求实存真，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它是一个党和国家认可的讲真话的园地，是一份敢于求实、勇于担当的媒体。邓小平同志说过，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转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241页）。现在正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需要倡导这种精神。而在培育这种精神方面，《炎黄春秋》我以为堪称模范。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我也同样。所以有了稿子首先想到《炎黄春秋》。

问：既然您认为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叶、陈、胡、赵的作用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你的文章讲赵的篇幅那么大，讲邓、叶、陈、胡的篇幅比较小呢？

答：这主要是由我当时的工作岗位、活动范围和观察视野决定的。因为我个人掌握资料的局限，我只是对赵紫阳的工作细节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对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的工作细节知之甚少或者基本不了解，所以在写作此文谋篇布局时繁、简、略的安排自己也觉得有点失衡。这完全是因自己所掌握材料决定的，并不反映我对邓、叶、陈、胡、赵几人在改革开放中所起作用的评价。

问：您这篇文章的基调符合中央精神吗？

答：三年前，赵紫阳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的当天，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奉命发出通稿，其中讲到：“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段话表达了当时党中央对赵紫阳所做的评价。我在文章中所讲的故事，就是对“有益贡献”所做的一点诠释，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

问：这样的文章在国内杂志上公开发表，是否一个重要的信号？

答：有人会误以为这篇文章的发表（下转62页）

欢迎登陆

炎黄春秋网

www.yhcqw.com

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创刊于1980年《炎黄春秋》

2008年1月5日星期日 首页 | 注册/登录 | 在线订阅 | 广告服务 | 新闻论坛 | 新闻博客 | 读者来信 | 关于我们

经典文章 本期目录 文苑行踪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中国是怎样受小平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怎样来

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

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几点建议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关于私有化的一点思考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

总结一稿年的几点反思

政治运动与学术繁荣和

崛起半截子还是比肩齐

改革第三次争论，标志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

要因素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美国近期“三大大选”

精彩栏目

首
往
在
广
告
炎
炎
读
读
关
于
我
们

特别推出

核
心
作
者
经
典
文
章

特别开办

刊
外
稿
区
炎
黄
论
坛
读
者
调
查



2008年第1期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深入平实，令人下笔其思，应期 刊之中，具有独特特色。

本期目录

【特别】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纪实】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犯正确”与“紧跟错”

悼柏杨先生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